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5月15日第11期 总第25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5期

地方文革专辑（8）

【专稿】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到溃堤（1959年—1967年1月8日）

第三章 溃堤（1966年10月—1967年1月8日）

十四 走出三家巷

十五 社会造反个案及“大数据”

十六 阎红彦困境

十七 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话题

十八 走向深渊

十九 硬汉赵健民

二十 死事

二十一 余音：“一·一三大裂变”

【综述】

启之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资料】

二·二三前后青海省无产阶级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月23日至3月28日）

【文摘】

赵园 视野、境界及其他——治学杂谈之二

【读者来信】

何蜀、陆水林、胡宗式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周孜仁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到溃堤（1959年—1967年1月8日）

第三章 溃堤（1966年10月—1967年1月8日）

十四 走出“三家巷”¹

为了与若隐若现的北京“资产阶级司令部”撇清关系以求自保，亦为弹压本地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以稳定秩序，归根结底，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忠贞不二，云南省委的大员们稀里糊涂又心存侥幸地和北京一次次较劲，费尽了移山心力，如今半年时间过去，依旧看不到曙光明朗，相反，“右派”学生气焰愈益嚣张。如果将时间坐标往前再挪一挪，那么还会看到，共产党执政17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一次总会为自己制造一大批对立面，积累一大堆矛盾，早在坝下渗出无数溃洞，这番学生浪潮一冲，暗流蠢蠢挤涌，管涌已成，只要上帝之手再捅一捅，溃堤很快就发生了。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典，林彪按毛审定的稿子在大会宣读，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再次特别指出，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

¹ 指文革时的昆明大学区。

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何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界对此概念多有热议，但有一点很明确，即：所谓“资反路线”绝非刘少奇、邓小平的文革新发明，文革前共产党一直都是这样干的，派工作组更是政治运动的成熟战法。学者杜钧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面》一文¹提出，十七年的政治管理形态有三大要件，即：党支部专政，档案制度和政治旧案。所谓“党支部专政”就是以基层党组织“形成一种政治等级结构，平时即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政治运动来临时，三类人员自然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为了区分左中右，就须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是否‘积极靠拢组织’的标准，当然也作为升学、入党、提级、提干的标准，并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命运。”档案制度和政治旧案的文字记录这两条非常致命。一个人的档案，表征着你在体制内的存在，注定你能享受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待遇，如影随形，不离不弃，一旦失去档案，你就什么也不是。更可怕的是你虽有档案，档案里记录的偏偏是你本人根本不知道的暗污潜罪，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亲属有“杀、关、管”、你某时某地对某人说过何种妄言谤词……比有暗污潜罪更可怕的，是档案记有你“疑似”暗污潜罪，比如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牢，莫名其妙又出来了……等等，因为“疑似”，更方便想处置你的领导随意发挥。文革中刘少奇的厄运不就这样吗，薄一波之流的灾难不也如此吗？遑论老百姓？当局想收拾你与掐死一只蚂蚁无异。只不过遇了运动，党组织或工作组会多一些“阳谋”，多一些“引蛇出洞”再“秋后算账”一类战法。1966年10月，毛花样翻新，提出“批资反路线”概念和号召，具体目标所指却很清楚，就是对庞大的官僚体系，不仅要清算“五十天（即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所言，从1966年6月1日

¹ 载《记忆》第68期，2011年2月28日。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也要清算“两个月（从十六条公布到九月底）”。这个口号，不仅给尚处于社会少数的学校、个别工厂的造反派提供了最具杀伤力的思想武装，继续引申下去的，对十七年来全社会所有遭遇政治迫害、渴望对官僚集团报仇雪恨，并侥幸改变命运的受难者，亦不失为一个很具煽动力的口号。

除了提供理论武装，毛还为群众造反准备了一盘实惠的政治大餐。10月5日毛批准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¹ 11月16日再次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²这些规定无疑受到最广泛的民意支持和拥护。

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三所高校围墙间那道宽40米长300余米的通道“三家巷”，曾是昆明市民寻找新信息、选择新命运的政治集市，那儿日日大字报爆棚、夜夜挑灯辩论，甚至拳脚相向。而今早已容纳不下如此集聚膨胀的政治大爆炸。大标语、大字报、宣传车、辩论会大批涌向了真正的市中心地带：近日百货大楼。

十五 社会造反个案及“大数据”

昆明远郊生产常规武器的大型军工厂200号信箱工人刘志宏，关中后生，一脸络腮胡，

¹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² 同上。

一身北人的耿直与豪爽，1959年他从西安机械学校毕业响应号召支边，3年后即因表现优秀评为昆明市先进共青团员，被安排到昆明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位处市区，刘志宏天天在百货大楼看大字报、听辩论，对照中央宣传的精神，他觉得学生确实“造反有理”。刘说，他记得非常清楚，9月6日，云大最早的造反学生之一、后来成为第三种势力“炮三师”领袖的陈立新在百货大楼贴出大字报，随即遭到保守派群起围攻，路见不平，刘志宏憋不住上前相助——此事被人一状告去厂里，马上被党委召回厂交待认罪。待到批“资反路线”后，陈立新带领云大学生去200号串联，刘公开造了反。1973年，云南省恢复秩序，成立总工会，他任副主席；1976年十月政变后，他以八二三派大佬的通用“罪状”被投入大牢。

八二三造反派的另一大佬，甚至一度有“八大金刚”之称的沈炳章则典型江南书生，扬州才俊，俨然白面书生。他18岁考入南京电校时已得双助学金。1956年毕业分来云南，先在马街电厂劳动，很快调入云南供电局作技术工作，1958年组建国家级的昆明水电设计院，他又被调入。1960年因表现优秀被吸纳入党。此前的1958年，沈报考重庆大学电机系函授班，学习5年毕业，300多函授生仅7人通过，他以优异成绩有幸忝列七分之一，并成为设计院火电电工大组负责人之一。1965年，云南电力系统开展四清运动，电工大组其余二负责人皆老知识分子（一为王可雍，女，成都工学院1954年毕业；一为陈钦柱，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沈年轻且为共产党员，自然由他领衔四清组长并负责帮助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沈炳章回忆，他上万言的大字报，主要批评“38式”院领导经常收受专、县水电系统送来米面等礼仪，有时还请电校女生吃吃喝喝，生活作风大成问题等等……不料四清结束，领导没扳倒，电工大组倒揪出一个“王可雍反革命集团”，王为主犯，陈从犯，沈为党内代理人，全大组几十人被牵连。文革来了正好，批资反路线，知识分子全反了，而且直接找省委一把手阎红彦要求平反。沈炳章记得清楚，他是12月16日正式造反的（比823主力省建12.6兵团成立晚10天），他之所以没当成电力系统一把手，皆因马街电厂孟玉才亦造反在先，孟宣称他造反时，沈还是保守派，再说孟是工人，优先级高于知识分子。

后来成为823派二号头目的刘殷农，在部队是五好战士，复员昆明市公安局，亦因工

作优秀而深得领导赏识。他这样讲述了自己的造反经历：1966年10月，面对昆明市中心满世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作为精干力量，由政治处领导当面向他布置了新任务：

1. 从现在起，你直属局领导，工作情况不需要向处里、科里报告；2. 你的任务就是收集昆明地区的文革动态，重点是掌握昆明百货大楼一带（市中心闹市区）大字报的内容和红卫兵的动态；3. 你暂时脱离现在的工作岗位，不用坐办公室了，你的专业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听广播，晚上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简报，一日一报。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就整天在街上转，听广播、看大字报，渐渐的我被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吸引住了。其中，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毛主席曾经讲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林彪也曾经讲过“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内容都是我这个驯服工具从来也想不到的。随着红卫兵到昆明人数的增加，昆明的造反火焰被他们煽得越来越旺，除学生运动外，厂矿企业的工人也在跃跃欲试。我的任务也因此增加了一条，就是掌握昆明市民的动态。

由于整天在近日公园¹周围转悠，常看大字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当我走近一群人，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时，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务的盯梢”。我一时被弄得非常狼狈，只好转身离开。

此人的这一声断喝，警醒了我：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战士，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怎么就变成了狗特务呢？但仔细想想，自己所执行的工作任务，不就是特务干的吗？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怎么一到昆明就变成了洪水猛兽，监视他们，自己不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了吗？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在脑海里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最终冲出了桎梏自己的牢笼，我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云南省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个决定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写大字报批判省委。支撑我作

¹ 近日公园其实为一小小街心花园，位于市中心昆明百货大楼商业区，故一直系昆明最热闹之所。

出这个决定的是那时候国人皆知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熬了几个通宵，写了一篇万余言的大字报：《炮轰省委》。大字报写好后，我又找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在我确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时，便下定决心造反了，我知道，我造反的后果，被捕是很有可能。

刘殷农临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详细记录了他担心造反可能被抓而做的各种准备，足见考虑问题的缜密周全。只是他真的被当局抓捕，发生在10年以后，文革破产，云南开展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批、查运动，刘殷农以反革命颠覆罪被判刑14年，投入大牢。

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如果事前知道等待他们的历史故事会如此残酷荒诞，他们肯定没有勇气走进迷局。可惜他们确实太年轻，而毛泽东的口号总是那么具有蛊惑力。文化大革命，连许多饱经磨难的老家伙都经不住诱惑，咋能责怪这些年轻人呢？

“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赴京人员得风气之先，10月11日，迫不及待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云南省委、昆明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昆明这边厢，黄兆其牵头，于10月20日组织昆明工学院几十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第一次形成了单个学校，人数最多的学生组织的集团力量。继而由昆工“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牵头，在首都三司南下红卫兵支持下，联络全市各大中专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砸了保皇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首倡“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服务”的口号，及对保守组织“打砸抢”之风已在各地狂然成风。现在轮到昆明了。

“三字兵”总部所在地“胜利堂”位于昆明旧街，纪念抗战胜利，由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设计而成，共产党执政，又改为人民胜利纪念堂，简称“胜利堂”，造反学生一番打砸，顺利接管了所有办公用品，並立即协商成立了联合全市各大中专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昆明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联络站”：这是昆明文革造反派走联合道路的第一个组织形式。

10月23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42所学校1200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

次日（10月24日），姚文元和戚本禹在北京接见云南大学造反派，肯定他们批判云南省委的革命行动，鼓动他们继续深入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云南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有中央大员撑腰，云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澎湃，从学校到机关、到厂矿，各色造反组织只见蓬勃发展：

10月27日，昆明市邮电局造反派职工成立“工人战斗总队”，拿当时习惯提法，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杀向社会”。

11月7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省委的反。

次日，有全国八大机床厂之一美誉的大型企业昆明机床厂工人，突破厂当局阻拦，也“杀”了出来。他们从远郊茨坝徒步数十里地来市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获鼓舞。该厂成立的造反组织遂以该日子：“11.8”作为自己的字号。

11月20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和昆明地区学生“造反派”在昆明拓东运动场召开“炮打刘明辉大会”，批斗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刘明辉。刘明辉，江西永新人，早年参加红军，算得老资格，一贯谨小慎微而工作无多建树，却因善于生活而遭人诟病。机关干部胆小谨慎，拿他试水风险最小。

11月23日，大型企业云南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一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杀”向省委大院。冶金机械厂距离省委大院不过几百米，造反派和看热闹的自然人多势众，轻易就揪斗了阎红彦及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是日，参加革命行动的十余工人造反组织兴高采烈联合成立了“11.23战斗团”。

11月30日，大型企业云南汽车修配厂工人进城看大字报，机修车间指导员张书堂派人盯梢，被众人发现，工人张勋（大理人）立即组织批判，从而造反，成立“毛泽东思想11.30战斗兵团”，实际领头人施光兴年纪大，因知档案说他“特嫌”，暂时不敢冒头。

12月6日 大型企业云南省建公司工人造反派联合成立“12.6战斗兵团”，两个月后，据头儿杨树先向周恩来汇报说：全公司18000人，他们的造反派有8000多¹。

.....

已经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了。为适应形势发展，十一月下旬，黄兆其及时与“昆明市中中专学校红卫兵联络站”各负责人协商，一致决定撤消“联络站”，成立“昆明文革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领导班子除了学生，增由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等各方面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新班子推选黄兆其任一把手、刘殷农任二把手、杨树先(省建筑安装公司工人、126战斗团一号头目)为三把手，学生造反派李毅、方向东、张国荣、陈立新、姜月生等忝任常委，参加常委的，还有大批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代表，如李树林、陈文才、唐国礼、李积德、何吉昌、赵培和、孙根芝、金一旦、刘志宏、苏德君、王国忠、唐元林、马崇恩、张显忠、李光德、刘向东、王云仙、沈炳章等。工农机关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以体现工农兵的主体作用。位于旧街的“胜利堂”已不敷使用，指挥部改易地点至昆明市政治中心：昆明检阅台对面的工人文化宫（现东风广场）。上述各界代表，后来都成了名震边地的文革达人：李毅成了群众组织分裂后炮派的一把手、陈文才成了八派的“武斗之花”、刘向东成了派斗被打死的最早牺牲品，以至他所在的著名企业300号信箱八派以他的名字将组织重新命名为“刘向东兵团”、李树林为“红小鬼”，后来成为“新政权”执掌老干部命运的审干专案组“一办”头目……与这些人物相关的“11.8”“11.23”“11.30”“12.6”等等，和象征八派和炮派的“823”“914”一样，这些数字从此成为官僚集团的噩梦，将在下面反复出现，其故事此处暂不录。

12月11日，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了云南省首次“炮打司令部”大会，第一次喊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把“炮轰省委”聚焦到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身上。

十六 阎红彦的困境

¹ 见1967年2月28日“周总理、谢副总理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凤展红旗》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第34页。

为了正式推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10月8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以排除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云南参会3人。会前，中央致电云南省委谈参会人员问题，提出要有省委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参会，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云南省委意见一致，没有不同意见”，遂定由阎红彦、赵增益（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马文东三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用他的习惯语言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重头戏则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下发时题目改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针对“血统论”，报告尖锐指出：“为什么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最好让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报告强调各级干部要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他批评了“用宗派主义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要求“坚持用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毛泽东对此报告评价甚高，10月24日23时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¹

毛泽东已经摊牌，被逼到墙角的云南省委不得不出子儿了。从11月5日到30日，省委召开工作（扩大）会议，即所谓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传达、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问题。按原计划，用15天解决“认识”问题，5天安排“四清”、财贸、生产，约20天，但实际到12月2日才结束，会期共1月左右。基层干部被逼到墙角，会上只听得一片牢骚之声。官方资料记录：“三干会议开始，许多干部就纷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很不理解，有的说这场运动是‘打闷棍’，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当成敌人住死里打’对‘炮轰’、‘声讨’等口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搞法，‘大方向不对头’‘一定有坏人捣乱’，盼望‘有朝一日，来一个反击’”²。民间资料记载更多些，说原省文革小组成员、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在会上这样“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我想这些人写文章倒可以，作领导工作不行，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能力。”而

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²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64页。

阎红彦夫人、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如此评价被毛泽东高度肯定的陈伯达：“这些大理论家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你唯一的理论家讲话，也要叫下面能够理解嘛！”“陈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还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她的发言直指林彪：“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在如此一片“集体无意识”氛围之中，张曙光把话推向了极致，说中央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这次尽搞的是北方局、西北局，就是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¹

除了让下属们（包括自己的夫人）发发牢骚，阎红彦只能忍气吞声，自己不敢擅越雷池，还得想办法做一盘看得过去的菜端给毛泽东交差呢。云南省委党史办的史志这样记录：“为把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省委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学习文件与亲自实践相结合，揭发批判省委与自我检查，我提高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到会干部到学校串连，和学生开座谈会，观看红卫兵扫‘四旧’战绩展览，参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会，听取省委负责人的检查等等。干部的不满情绪表面有所缓和，但实际并未解决。三干会以后，围绕揭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次，从上至下，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领导班子完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²

“三干会”让全省官员齐聚昆明，给造反派打打击当权派威风提供了一个大好之机，据记载，会议期间，由昆明地区及南下串连红卫兵主持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即多达10余次。其中声势最大、由阎红彦偕省委及地市领导参加、并亲自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的共两次，一次是三干会开幕时的11月8日，另一次是会议结

¹ 参看《风展红旗》。

² 党史办资料 第60页。

束前的11月28日。两次的结果都是：“造反派认为阎红彦的检查敷衍群众，避重就轻，没有谈及思想本质”“未获得造反派谅解”“责令他继续深刻反省，认真检查。”¹

地点都是检阅台。检阅台位于昆明东西干道东风路一开阔广场，中共建政之初，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包括社会生活方式。每年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市民展示劳动的自豪与快乐，都要高举红旗，穿戴鲜艳，来此高台下游行，接受共产党官员们的检阅，表达自己的敬意和驯服。现在，事情则完全翻了一个个儿，检阅台成了羞辱、嘲弄当权者的舞台，亦成了草民百姓显示自己威风的场所，全无当权者和百姓之分，谁想上都可以上。市民的情绪是岩浆，在地下熔炼，这儿便是火山口。

对于自己的角色转换，云南省最高官员们显然无法习惯，而所谓检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会会场于是乱相百出，满场百姓亦频频起哄快乐。据亲历大会的原省计委基建处干部华锦标回忆，11月8日批判会，阎红彦作公开检查，念稿时错一句，台下便一阵哄，他赶紧解释：“念错了，念错了，原稿是这样的……”其时，参加批判会的地委书记们都坐观礼席位，大理州书记邵风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屁股下，被红卫兵发现，当即呵斥此“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马上罢官，阎红彦不知如何是好，忙不迭要邵挪开，说：“你不能坐这儿，快靠边站吧！”²此事，官方史料的记载印证了这一滑稽故事：“（造反派）以大理地委书记邵风执行了‘资反路线’为由，逼迫阎红彦当即在检阅台上召集省委常委，决定罢了他的官。”³

云南汽车配件厂造反派头头何吉昌说起阎红彦一件事，亦可印证官史这一表述：某日，云南汽配厂工人在公路局幼儿园召开批资反路线大会，实际是要罢某领导的官，“勒令”阎红彦来会表态。阎规规矩矩去了。开始，阎以为工人如此大动干戈，要他表态罢免的至少当为交通系统厅一级什么官，到了会场才得知，工人们要罢的，仅仅一车间主任，阎哭笑不得，当场痛快表示：“罢！罢！罢！”

¹ 这是《风展红旗》的提法。

² 笔者与华锦标谈话记录。

³ 党史办资料，第60页。

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中将夫人郭青女士，作为滇南开远“解放军化肥厂”驻昆办事处主任，长驻省会，得风气之先，成了最早的造反派。昆明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也冲上检阅台揭发，大翻二十年前的老账，说1947年8月，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实施著名的“豫西牵牛”战略计划，为保证部队行军机动，决定让家属全体暂留北岸，此事由阎红彦负责安顿。郭青作为家属支部书记，对此不满，约集家属向阎集体起哄，要求随军南渡，兵团最后不得已派兵回接，不幸牺牲战士多人。郭青在“批资大会”上就此向阎大张挞伐，阎则坚持说明当年此事系兵团集体决定，绝非个人自作主张。二人在检阅台万人睽睽触目之下吵了个不休不止。

电力工程师沈炳章，“四清”被打成“反革命”，1米8的大个子背着不满两岁的娃娃、怀揣一封状纸也闯上检阅台，要正在挨批的阎红彦给他平反。文革前，省委经常为修建“以礼河水电站”的捷克专家举办舞会，电力局总让沈带一帮女职工前去伴舞，与同时前来跳舞的阎红彦有些眼缘。检阅台上正做检讨的阎红彦小声对沈应承：“把告状信塞我裤包吧！”事后，阎红彦还真让省委组织部派来二人做调查，结果不了了之。文革大乱，也只能不了了之。¹

18日那一次大会，阎红彦说了一句云南文革中影响很大、流传甚广、非常经典的话：“云南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没有犯路线性错误”，身处现场的刘殷农回忆说，“这种把方向和路线分割开的辩解，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嘲笑和愤怒”，趁领导被动之机，群众提出要推选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阎红彦马上同意，大会当场推选了7位代表：7人的机票全部由省委买单。²

这真是共产党执掌云南政权的委员会史上非常奇特的会议。大权在握的第一书记，现在整个儿就成了一受气包，基层官员只管对他发牢骚，而造反派群众把他当成一袋土豆，随意扔来扔去。这个陕北汉子现在确实够难了。打内心来说，阎红彦的心情肯定向着和自

¹ 2017年笔者采访。

² 首都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的赴昆学生3人：桂尤喜、高仰义、郭红兵，昆明4人：海可导，刘殷农、侯德勲、郑刚。

己一样遭受上下夹击的干部同僚，但他知道这次运动，毛泽东就是要老百姓来敲打他们，他们发牢骚完全可以理解，他担心的只是事情过了头，包括他自己统统倒霉。前面说11月8日的批判会，阎红彦摄于群众压力，不得不当场罢了大理州书记邵风的官，“会后，阎红彦即让人转告邵风说，出于压力，希望理解，表示歉意，此决定不算数。”¹

对于干部的情绪，闫红彦只能尽其可能平抑，无可奈何了，则不得不以赌气对赌气，让他们别过分越线。三干会开幕第五天即11月10日晚，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座谈会，有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主持会议的阎红彦如此插话：“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他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威胁：“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12月2日，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当晚，阎红彦对地市委书记讲话，以这样一句牢骚结束：“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²。

与昆明检验台的批判会相比，越到地州，这类批判越暴力越野蛮。远离昆明的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与其他地、县委领导身背“黑材料”，押去万人大会接受批斗，在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康不断遭拳打脚踢，为了焚烧“黑材料”，群众干脆将身背“材料”的他直接推进烈焰之中，康昏倒在地，群众还骂他“装死”，直到康再也爬不起来，方才送去医院，伤势已重，救治无效，含冤而逝。成为云南省第一位在“文革”中，在批斗会上被群众暴力直接致死的地委书记。

作为本段补充，需要说说康书记之子康晓东。失去父亲荫庇，小伙子长成后只能去滇西北大山中的“黑白水森林工业局”当林区卡车司机。文革破产后时来运转，得父亲同僚关照，落实政策，调到云南省人大小车班，再后来，搞了一个大学函授文凭，且与糟糠之妻离了，又与同样离掉“糟糠之夫”的某副省长之女喜结连理，从此节节高升，安排到省

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60页。

² 见《风展红旗》。

林业厅为官，最后官至云南司法厅副厅长、监狱管理局书记。2014年，因收受多家房地产企业贿赂500余万元，获刑15年¹坐进本该由他执掌的监狱，苦度余生。

十七 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话题

阎红彦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说辞绝非口误，而是真实的心结。资料介绍，三干会结束当晚，他再次强调了“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限要划清。”事实上，文革期间，论及许多问题，云南干部们都喜欢分开处理“方向”和“路线”。所谓“方向”是指批判、打击对象，如前面说到的“牛鬼蛇神”“右派”等，当然包括后来已经搞明白的“走资派”；所谓“路线”，则是指依托对象、具体说就是你背靠的“山头”。所有，云南文革后来便有了反“秦（秦基伟，说是贺龙山头）”“肃薄（薄一波，所谓61人叛徒集团）”“肃李（李成方，属薄一波叛徒集团山头）”思潮，接着又有了以是否跟随赵健民为标准的“划线战队”一类重大政治主题。虽然报纸上老说要“跟线不跟人”，事实偏偏是路线跟对了（山头投靠对了），一切皆对；路线错了（山头投靠错了），一切皆错。我们在稍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在文革云诡波谲的斗争中，云南许多干部赌场上注一般选边站队，结果总是稀里糊涂地“犯不完的错，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有必要从心理学角度小结一下各阶级的心态：

先说阎红彦，他坚信自己铁定是毛泽东路线的人，方向错了（对准群众，没有对准当权派）也没关系。有靠山毛泽东保护，阎红彦非常侥幸坚信自己一定能顶过去。根据多位老干部事后回忆，说阎红彦在云南是很霸道的，平时谁也不敢忤逆，“上将”军衔放在那啊！连赫赫有名的上甘岭英雄秦基伟在他面前，也只能“你老人家长”“你老人家短”地捧着端着，对比一下当初整于一川反党集团、文革初整高治国反党集团，甚至对照派工作组整学生的凶狠，现在的阎红彦，对群众态度真够可以了，转弯也转得够可怜的了，拿刘殷农的话说“作为边陲云南的省委书记，阎红彦已经放下架子”，邵风的官也罢了、沈炳

¹ 中国新闻网 2014年06月26日消息，记者王艳龙。

章的信也处理了，汽配厂的车间主任也罢了，再说，他有多少具体罪状呢？没有，无非“没触及思想本质”“未获得造反派谅解”“敷衍群众，避重就轻，”等等，这些算得什么呢？

干部对于运动则是绝对反感、对抗的，理由很简单，矛头就对准他们啊！从来是他们整群众——虽说四清运动也是整干部的，可那时叫洗澡下楼，而且是局部，是党委领导，而这一次规模大得多，而且是任由群众胡闹，告“天下大乱”，毛泽东就是要让所有干部都脱一层皮。阎红彦非常理解同僚们的对抗，但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作为一把手的苦衷，和他一道共度难关。

社会人士、工人、市民……情况就复杂得多，除了文革几十天，还有十七年，自己或有气要出，或有仇要报，或想改变命运，或纯粹为寻找快感……反正“资反路线”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简直就是无底洞，永远也装不满。

学生造反派是最简单的，除了捍卫毛泽东，捍卫一个虚妄理想的纯洁性，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文革开始，他们一门心思跟毛泽东反修正主义，结果被工作组、进而市委、省委欺骗、欺负、甚至打击迫害，于是感到委屈和压力，唱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好过些，就感觉毛泽东和他们心连心。现在知道了这些东西原来就叫“资反路线”，批判起来自然力大无穷。他们觉得每一次都是毛泽东解救了他们，现在几乎完全就被宠坏了，脾气也就特别大，对于失败者便永远不依不饶，简直就胡搅蛮缠了。12月14日，得理不饶人的云南大学造反派高调发起一个约7万人参加的所谓“纪念‘九一四’三周年大会”。914事件不过就学校里闹闹事而已，又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是天安门五四运动，而且不过三个月罢了，也要让人家大张旗鼓纪念，要《云南日报》报道大会情况，要省委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这确实有点过分。省委官员理所当然拒绝了，造反派们立即率队“杀”到云南日报社，强行封闭了《云南日报》地方版，逼省委和报社领导答应出《新闻电讯》，致使1966年12月15日至停止发行《云南日报》。直到1967年1月13日，云南日报社造反派夺了权，才重新出版所谓“新一号”。

仇恨的行为性状很像牛顿力学三定律：1、没有敌意的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和谐状态不变，除非外加某种恶性事件而挑起仇恨；2、仇恨的强度与恶性事件的烈度成正比；3、仇恨与被仇恨的强度相等，作用力方向相反。此外，双方仇恨会因共振而将其破坏烈度无限放大。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烈度最大的恶性事件。所有人都会在相互仇恨中互害而难逃劫数。这个互害循环终点何处？云南百姓也不知道，阎红彦和他的同僚们不知道。

1966年12月26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举行“夺权”前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给国务院一个莫名其妙的请示报告：省民政厅提出的建议，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倡议，把弥勒、彝良、麻栗坡、宁蒗四县和昆明市盘龙、五华两区分别改名为永红、东辉、红边、大兴和东风、新华区。这个请示报告国务院当然没有批。¹

1966年的最后一天，云南省委也发出了一个《关于目前省、市级机关文化革命时间安排问题的通知》，确定省、市级机关原则上实行半天工作，半天搞文化革命。按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都应当挺身而出，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地支持群众闹革命，认真负责地解决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把矛盾上交”²。这个煞有介事的通知，事实上也毫无意义了。因为离云南省委的一把手的生命终点，只剩8天功夫。

十八 走向深渊

随着批判“资反路线”运动风起云涌，“炮轰派”势力越来越大，从大、中学校波及到大的工厂，相同观点的各种战斗队也联合组成各种“战斗团”或“兵团”，在检阅台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达10余次，虽然官方和民间资料相关记载均无准确记录，但1967年1月4日这一次是云南文革历史必须记住的。此前两天，即1月2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刚刚宣布联

¹ 《当代云南大事记要》1966年卷。

² 同上。

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如此重要的组织成立，必然需要相应的重大活动加以宣示，这个事件就是：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且“勒令”阎红彦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

其实，如果阎红彦如前两次一样出席了会议，事情很可能不会太糟，问题是这次偏偏出了问题：阎红彦没有来，或者因为拒绝，或者因为逃避，反正没有来。关于这一点，官方的托词是：“会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尚未解决，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担心在大会上发生武斗，而且有许多工人学生和干部也不同意开这个大会，声称如果南下学生鼓动一定要开这个会，就要停水、停电、罢工、罢市。省委担心参加大会会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决定不参加这次大会。”¹笔者参阅了相关资料并参访多个亲历者，其实这次大会前，并不存在什么“尚未解决”的“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当时造反派两派尚未分裂，恰恰相反，他们刚组成大联合机构，正同仇敌忾对付省委，即便有小矛盾，也不是需要省委解决的）；其次，保守派当时已江河日下，早无还手之力，焉能主动挑衅？再说，检阅台的批判大会已开了十多次，保守派要闹事，干嘛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闹这一回？

笔者以为，阎红彦不出席大会，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上。按照三干会期间阎的表现和心态，去群众大会接受批判甚至羞辱，心中定然是不乐意的，但出于他对毛泽东（即所谓“路线”）根深蒂固的崇信，他应该硬着头皮去参加的。可是一旦作为议题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事情注定马上糟了。中国古语云：“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当此书记有难之际，谁人不想争先恐后表示忠诚？于是纷纷表态反对出席，说阎书记长期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中央工作会议后被各种造反组织不断勒令参加“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最好回避休息。阎红彦本是个缺乏政治柔韧性的莽汉，碍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当了几个月的受气包，心理承受力已近临界点，有众人如此“劝进”，自然乐意顺水推舟，一躲了之。参加会议的书记们之中，为保卫阎红彦

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65页。

而抗争者，确有一位硬汉英雄，此人就是赵健民——我们将在下面介绍他的故事——最后，还有一个必须一提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1月3日这天，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突然到昆明来了，这一次，他不是来面授机宜，而是逃跑。史料记录，1966年11月13日，四川三千会期间成都地区组织“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趁乱遁隐，一直在灌县、彭县、西昌、渡口一带悠游。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建议，李让秘书致电中央办公厅请示欲去北京，未得回复——当时北京局势已混乱不堪，竭力想控制局面的陶铸自身难保，新年刚过三天即被打倒¹——李井泉干脆破罐子破摔，决心秘密避祸上海。1月3日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会会议透露：“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当晚，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来到昆明。阎红彦亲自安排住小麦峪云南省军区警卫团，李、阎二人作深夜长谈²，然后于1月4日由闫将李送飞上海³。顶头上司尚且如此逃命，阎红彦和他的同伙们，为何不能效法？总之，最糟糕的情况就这样发生了，而且要了第一书记的命。

1月4日，“大联合指挥部”和“南下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的批判大会时间是晚上七点，检阅台数万群众应召而来。大会主席台成员刘殷农回忆道：“阎红彦头天晚上在检阅台当着数万群众，口头保证一定按时参加的。”刘说，“当数万群众按时聚集到会场时，阎红彦却迟迟不见露面，预定七点半召开的大会，等到了八点半，阎来不来参加会议，仍无消息。当时阎红彦是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保证一定到会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引起了到会群众的极大愤怒。”⁴

事实上，书记处会议之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第一书记阎红彦更被严密保护了起来，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银山全权负责，将阎及夫人王腾波、省长周兴一起转移到了距离市区10多公里的小麦峪省军区警卫团躲了起

¹ 何蜀：《红卫兵绑架李井泉》，《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² 民间资料有云：“二人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军区内部斗争激烈，xxx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这些只有上帝知道的事情，仅录以备考。完全可以证实的仅仅是第二天，1月4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打倒。

³ 李井泉于1967年1月18日被重庆大学815战斗团郑XX为首一行6人于上海市委瑞金路招待所“智擒”，解回四川。后，郑XX因此事被收审并开除党籍。

⁴ 摘自刘殷农回忆：《一个幸存者的自白》。

来，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明辉、孙雨亭等人则转移到省第一监狱内的林家院，共产党省委玩起了集体失踪。

批判大会开会时间原定晚7点开始。严冬，昆明已入夜。检验台前人头涌动，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语录歌响成一片。大会主角迟迟不来，大会主席团成员们作难了，刘殷农回忆：

有的同志主张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个三天三夜，看他阎红彦来不来？但是广场上的群众已经不耐烦了，纷纷喊口号。这时，突然有一位军队干部向我反映，说：阎红彦这段时间一直躲在昆明军区大院内。我把这一情况通报了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有人就提议，既然阎红彦躲在军区大院，我们就到军区找阎红彦。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体主席团成员的同意，到军区找阎红彦完全是事发突然，没有什么预谋和策划。当时大家全凭着一股热气，根本没有人想过，昆明军区大院是军事禁区，卫兵不让进，怎么办？主席团作了决定后，由黄兆其同志向大会作了宣布，阎红彦作为堂堂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无视数万人的要求，躲到军区大院，那么我们就到军区大院见他。

数万群众就此出发，直奔昆明军区。洪水已经决堤。大门卫兵根本无法阻止汹涌澎湃的乱民，刹时间，大院内人山人海。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急忙来院坝会见黄兆其、方向东及几个首都红卫兵代表，大意说：阎政委虽然是昆明军区的政委，但他主要工作在省委，阎政委不在军区大院，我们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们到军区来找阎政委找错地方了，希望你们退出大院。昆明军区担负着援越抗美等重大的战备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影响了战备任务。崔的说词毫无作用。昆明寻常百姓，能进入平时可畏的大院，大摇大摆底走进走出，本身就很刺激，平时在工厂班组、学校，死气沉沉，能聚会在一起唱歌，喊口号，吓得高不可攀的书记像老鼠一样躲猫猫，这也很刺激。军区大院的热热闹闹之中，第一个寒夜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笑容满面的军区副司令陈康将军又来了。他的夫人郭青在检阅台曾与阎书记过招，公开贴大字报揭发云南省委，众人对陈康多有好感。陈康劝

说道：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阎政委确实不在军区，要找阎政委你们应该到省委去。陈康的话很快又招来众怒，顿时“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持续数分钟，陈康只好无奈走了。

已经整整一晚。昆明冬夜，气温畸低。事情久拖不决，主席团越发为难，于是临时召集进驻军区的各大中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和各工矿企业负责人约两三百人，到军区大院对面的靖国小学召开紧急会，组成大会主席团商量，由黄兆其、刘殷农提出动议：1、把为什么要进入军区大院尽快用电报报告周总理，是阎红彦失信在前，我们才被迫进入军区大院的；2、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轰轰烈烈进入军区大院见不着阎红彦，难道就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撤出？对第一条很快统一了意见，遂由刘殷农执笔起草电报，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报给周总理。至于第二条“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众人一致表示：绝不能灰溜溜撤出大院，要在大院内安营扎寨，阎红彦一天不出来就等一天，一月不出来就等一月，一年不出来就等一年，要让省委明白我们的决心。”会议精神很快地达下去，进驻群众一片赞同。工矿企业造反派很快用车送来帐篷搭好，真的个安营扎寨了。军区大院内红旗飘扬，唱歌的、读语录的、看热闹的、生火取暖的、人声鼎沸，财贸系统造反派职工还将小吃摊点搬进军区大院，供应食品，煞是热闹。性急的造反者三番五次组织冲击军区办公大楼，军人却是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抵挡冲击，暂无大碍。横七竖八的宣传车则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各种讲话，“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秦基伟¹，把阎红彦交出来！”一类口号响遏行云。昆明工学院用大客车改装的宣传车设置最为齐备，成了主席团指挥车。接下来的华彩段落就发生在这辆指挥车上。

十九 硬汉赵健民

1月6日下午，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在军区大院里出现了。

赵健民，曾用名吴培强。山东冠县人。1912年生，20岁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

¹ 秦基伟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就学，参加中共并任该校支部书记。1935年任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同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8年被派往鲁西，任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曾任营长。1942年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领衔二野十七军政委兼军长进军西南，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1955年由铁道部副部长位调中共山东省委任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兼省监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大跃进，赵健民反对浮夸冒进，被华东局调来的舒同、谭启龙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三项帽子，交付全省批判，降职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得甄别后，于1963年4月调云南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赵建民中等个儿，短发白鬓，一望而为精明干练、敢作敢为之士，虽宦海沉浮，依旧倔性不改。

1月3日书记处碰头会讨论阎红彦是否出席14大会，满场一片“书记身体为重，不能参会”的劝进之词，唯赵健民的话掷地有声：“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1月6日上午，得知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群众要来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赵健民对郭超等其它书记慨然大呼，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然后径直去了众声喧嚷的昆明军区大院，

前一天5日，军区司令秦基伟就曾出面，向造反派反复解释：“阎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在军区”，造反派当然不信，劝说无果。6日中午，周兴亦前来找黄兆其、刘殷农劝和，说只要群众撤离大院，便劝阎红彦出来接见，黄、刘坚持先接见后撤离，劝和无果。

书记处办公楼位于昆明军区大门正对的国防路，距离不足千米。周兴走后，赵健民又来了。他径直找到指挥车，赵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阎政委身体不适，由他代表阎政委来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干扰了军队的正常工作，有问题、有意见由省委来给大家解决。其时黄已离开，遂由刘殷农和方向东与之论理，陈述“我们进入军区大院是被迫的，因为

阎政委失信在先，答应来又不来，为什么不来？也不派有关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现在，阎政委没来，赵副书记来了，我们表示欢迎。”好事群众早里三层外三层将指挥车围个水泄不通，当见赵健民手握话筒，大讲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云南省委内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云南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已是闹事第三天，天寒地冻，忍饥挨饿，群众满腔热血已沸腾，只管汹汹追问“阎王”何在？赵讲起话来肢体语言夸张，身姿动荡不歇，且不顾众人起哄，信誓旦旦甩出一句名言，他以党籍和中央后补委员的身份担保，不知道阎政委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语言论争已毫无意义。毛主席教导了，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被赵副书记激怒的群众一齐用肢体动粗，拿出高帽子对赵书记就戴，赵毫不怯场，三爪两把便将纸糊高帽撕个粉碎，还高调宣称“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已经狂野的群众面前，这些名头毫无价值，只不过在腾腾烈火上再添些燃油而已，七八条造反好汉干脆将他解上车顶，强摁跪下，将又一顶高帽直扣赵头。宣传车已经发动，大院内群众纷纷集合，簇拥宣传车向市中心游行而去，被迫载高帽下跪的赵书记无奈随车巡游，接受长街通衢市民们的嘲笑和羞辱。

是日晚，阎红彦便得知赵健民被戴高帽游街的消息，立即指示办公厅以省委名义给造反派写信强调，省委有错误可以批判、省委存在的问题由阎红彦自己承担、不要采取游街等违反“十六条”原则的方式揪斗干部、希望造反派尽快从昆明军区大院撤出，只要造反派撤出军区大院，他愿意立即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同时，阎红彦安排办公厅就对待造反派的工作、目前云南状况及下一步打算向中央汇报，特别指出造反派进驻军区的危害、反映赵健民被游街受伤，颈椎骨折，半身麻木的病情。报告经周兴修改，上报中央。7日上午，阎红彦再与军区司令秦基伟通电话，就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交换意见¹。

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66页。

可惜，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立即住进了昆明军区总医院不在发声，除了牢骚。阎红彦则依旧秘密呆在小麦峪，“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于是军区大院继续被占领。赵健民掀起的巨浪过去，一切归于原状。院内红旗飘扬，唱歌的、读语录的、看热闹的、生火取暖的、人声鼎沸，财贸造反职工的小吃摊点依旧给寒夜饥渴的示威群众提供汤食夜点……一些愤怒的群众又有冲进书记处办公大楼寻找的。他们到处插起造反派的旗帜，在门、窗、走廊墙上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被造反派占领，家被抄。

第二十节 死事

其实，作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家，面对曾经多次发生在无辜者身上的冤屈，他本来应该变得圆通油滑，厚脸皮。退一步说，如果读过历史，对中国的宫廷政治有点常识，贬黜、流放，后来又时来运转，重归庙堂，这样的例子太多。可惜阎红彦恰恰缺乏这一点。他刚愎倔强的性格、长期身居高位而已经固化的病态自尊，还有领袖对他特殊的恩宠，使他过分倔强的自尊心不愿意再去面对草民们的羞辱，他要崩溃了。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刚入睡的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接电。他一拿起话筒，便听见陈伯达怒气冲冲的福建土音，阎红彦说明：“我听不懂你的话”。

于是陈伯达就让一旁的汪东兴当翻译、转达他的话：“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顿时爆发了，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接着江青又在电话里指责阎红彦害怕革命群众。要他立即到军区大院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

阎红彦无语，放下电话，边走边骂：“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即又踱去隔壁周兴房间，将陈伯达与江青的话转告了，他约周兴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会见造反派。

周兴劝阎：“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做最后的了断，将床头的安眠药片悉数倒进喉头，再将桌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熄灯。

凌晨4时余，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已经得知阎下落的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向小麦峪冲来。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秘书接完电话，立即敲房间门，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应，过一会儿，还无动静，警卫员遂推门开灯，骇然发现：阎红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已停止呼吸！桌上放着一张写给夫人纸条：“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带领造反派赶赴小麦峪的刘殷农这样回忆：

进入营区门口，负责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表情严肃地告知我：阎政委死了。可能是自杀。接着，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字条有巴掌宽，长条形，上面写着：“腾波，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红彦。”随后，王银山带我进了阎红彦的卧室，只见阎红彦静静地躺在卧床上，雪白的被褥加盖了军用毛毯，面部表情安详，感觉就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有一个空药瓶，我看了标签，是眠尔通。我和王副司令员看完现场，默默地走出来，我们都感到无话可说。我向王副司令员告别后，乘原车返回昆明。

肇事的造反派谁也没想到堂堂的共产党省委书记，被他们一轰就闹出了这么一大条人命，实在让人惊恐，特别几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如果中央怪罪下来，真不知是何后果呢。好在那年月有个惯例，但凡自杀，均属“畏罪”，若为党员，则属“叛党”。再说，阎红彦公然白纸黑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江青、陈伯达，实在罪大恶极。9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很快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并批判之。

对于官僚集团，这个事件更加震惊，因为首先是对上司多年驯服而生出的潜意识情感依附，还有，如果继续允许造反派如此胡闹，可能阎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风展红旗》载：“张曙光等人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几十年后，此说已无法证实，确切的事实是，阎去世一个多月后，老帅大闹怀仁堂，职务比张曙光高得多的谭震林，亦对江青等人“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¹

1月9日下午，昆明市委、省公安厅等单位确实由市委书记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多个追悼阎红彦大会，公安厅的“追悼会”上，有人竟然抱头大哭。“红卫兵总部”等保守组织也公开组织了“悼念”活动。

对于北京当局，阎红彦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区区边疆小吏，实在算不得什么。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阅的《要事简报》稿上曾录入阎红彦去世的消息，旋被当事人陈伯达删去，陈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²

细针绵密的周恩来得知阎死讯，则于9日晨速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周明确指示：尸检由三方面代表监督执行，王银山副司令员代表军队；省委副书记薛韬代表省委；刘殷

¹ 见《风展红旗》。

²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68页。

农代表昆明地区群众¹。法医对尸体拍照、解剖等均在三方共同监督下进行，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12名人北京当面汇报。在京期间，周恩来听取了李成芳等领导的汇报，并3次听取黄兆其、桂尤喜等人汇报。在听了分工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汇报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王银山马上自责：“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安慰他：“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1967年1月12日下午3点，周恩来同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通电话，发来六条指示，要其转告秦基伟、周兴并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六条指示全文如下：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六、我希望省

¹ 1966年11月8日在昆明检验台举行的批资反路线大会上，阎红彦同意、并由省委买单送刘殷农等七人去北京告状。期间，周恩来曾3次接见，对刘颇多印象——见本卷第三章第十六节《阎红彦困境》。

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改变。¹

之所以有必要全文照引，皆因官方史料对这个重要文件采取了简略叙述，有意抹去“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和“反对矛盾上交”这些最要害的句子，不负责任地敷衍了真相。²

官方史料接着记录的情况当属可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后，省委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

半年后，7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复函云南省军管会：同意在《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再一年后，1968年8月10日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委会的批复，正式将阎红彦定义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再云南的代理人。

第二十二节 余音“一·一三”大裂变

云南文革第一波凶潮尘埃落定。阎红彦以他的性命确认了官方的完败和造反派的胜利。余下的问题是，天寒地冻的昆明军区大院里尚滞留着几万百姓，他们何去何从？恰恰因为这个，造反派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漫长的生死厮杀——正是闫红彦之死，触发了云南造反派的一场大裂变。

主持进驻军区活动的“大联合指挥部”本是一松散机构，而群众组织又本一哄而起，头面人物想法不同，欲望纷乱，性格各异，正如柏拉图《普罗塔哥拉斯篇》所言：“民众统

¹ 《风展红旗》编写组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8年4月。

²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71页。

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海上，每一阵演说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方向”。更何况文革这样的大风浪，政治骚乱的快感诱惑下，群众全变成被火焰熏燎而出的蜂群，只管哄哄乱撞，寻找蜂王和巢穴。这种环境最容易滋生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再说，眼看得大局已定，当权者已经落败，江山该有造反新主来主宰，原来的组合势必重新洗牌，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争夺王者的恶斗势不可免。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本土造反头领，他们还不足以让所有人给他们鼓掌。除了“八二三”，昆明不是还有一个“九一四”吗？除了昆明工学院，不是还有云南大学吗？更要命的是造反伊始，北京南下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亦可谓功不能没，他们干吗要轻易把果实拱手让黄、刘之流的昆明土佬儿独享？云南两派就厮杀的利剑，就在此时迅速地熔断出炉了。

周恩来定然预感到这种危机，在12日向云南官方发出六条指示后，13日又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给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来“支持电”，电文如下：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厉，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¹

这封电报显然是为造反派进入军区大院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再为他们体体面面撤出搭

¹ 《风展红旗》编写组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第5页。1968年4月。

一个台阶。其时正在北京的黄兆其和留在昆明的负责人刘殷农很快读懂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即表态：“我们马上向下面传达，响应中央呼吁，无条件撤出军区，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在退出军区大院前，在大院内开一个大会，大会结束，就整队撤出军区。”总理立即再嘱：“会不要在军区大院内开了，就到检阅台去开吧，在检阅台开能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刘殷农再表示当天24点以前撤出，周恩来说好：“争取让你们的代表明天也赶回昆明去。”既然总理发了话，黄、刘的动议也理所当然得到本土群众最广大的拥护。

“支持电”早上发来，负责进驻军区行动的“主席团”由刘殷农主持会议，很快做出决定：无条件从军区大院撤离，第二天在检阅台召开大会祝捷。中午2时，昆工823兵团带头撤离，兵团大旗和宣传车浩浩荡荡离开军区大院，插满草坪的其他造反团旗也纷纷拔起来，跟着昆工离开了驻守近10天的军区大院，时至下午五点，草坪上只稀稀落落留下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等几所大学和别的造反旗帜还在晚风中瑟缩，旗帜下零散坐些人坚守待命。

事实上，就是否“无条件撤离”的问题，上午的主席团会议就发生了分歧。反方首领正是“南下造反兵团”的首领高仰义。高原名高志伟，北京农机学院学生，中等个儿，相貌平平。在名校济济的首都，北农机实乃排不上号的小不点儿；在精英辈出的京城大学生群，高某也实乃无人侧目的芸芸之辈。皆因云南太偏远，又遇了文革大乱，遂使竖子成名。1967年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会上，高仰义曾当着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高官如此得意地宣布：“我们是支持黄兆其的。但黄兆其处理老是犯‘右倾’，黄兆其的‘右倾’是由来已久了，是老‘右倾’了”¹。恰恰因为太“左”，，在同一天的接见中，陈伯达不得不提出要“南下的学生都回来。如果不撤回来，呆下去，还在那里当指挥官，一定会继续犯错误。”1月13日，高仰义一党感觉还非常良好，他们坚持必须“有条件撤出”，条件凡三条：1.省委必须到军区大院向群众承认错误，公开检讨；2.昆明军区给群众平反；3.要在军区大院设立长期留守机构：联络站²。反对“无条件撤出”的理由是：“大

¹ 转引自《风展红旗》编写组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第28-29页。

² 官方记载略有不同，内容如下：“仍有一部分造反派抵制不撤，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军区要公开给群众平反；二、

会主席团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听取工人意见”“无条件撤出是右倾投降主义”甚至要“踢开右倾头头,自己干革命!”等等;中午,大会主席团再开会,“有条件派”和“无条件派”已经势同水火,事实上,当天下午,南下造反兵团已串联了部分不愿意撤离工人组成临时联络站(高方宣布,已有170多个单位参加了临联站,而“无条件方”认为纯属夸张,参加单位只有41个单位),并造了主席团的反准备;刘殷农于是第三次召开开会,当机立断宣布,必须当天24点前全部撤出。高仰义的“有条件派”也干脆宣布,要由“临联站”接管大会主席团的全部工作。次日上午,如原“大会主席团”在检阅台开大会,他们将前去夺权,发生冲突、甚至武斗也在所不惜。¹

了解1967年1月13日造反派的裂变故事和个中是非,有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就是14日凌晨周恩来与军区大院现场造反派长达数小时的热线对话:是南下红卫兵在值班室内利用军区电话并安好了录音机接通的。当时总理正在中南海接见黄兆其等云南代表,录音整理稿全文近20000字,按正常语速每分钟180字当为2个多小时,但其中又找人,又换人、又吵架,时长远超4小时以上。

周恩来必须将爆炸引信迅速掐灭,这一点再明确不过。周恩来既长者风范,苦口婆心,又在关键问题恩威并重,逼得“有条件派”自知理屈,纷纷败下阵来:

第一个是高仰义,刚要对“临联站”做出想解释,总理已一针见血:“你这样搞不是造分裂了吗?”,高只好托词溃逃,说“刘殷农同志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我请一个工人同志和你谈好不好”胡乱拖一个叫刘先礼的,刘乃云大学生而非工人,吓得马上躲开,再叫出昆钢叫陆林的工人,陆林也没见过世面,又吓得退阵,最后上来一个昆明机床厂名叫王旭辉的工人抵挡一阵。王首先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立即撤出。”但却责怪大会主席团做事一日三变,故无所适从,而现在夜半更深,天又下雨,他们有老、有小、还有家庭妇女,几十公里地,今天实在没办法撤。他一板子打到“大会主席团”屁股上,说:“根

秦基伟要公开写检讨,并贴到市中心百货大楼;三、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设联络站。这些要求遭到秦基伟等昆明军区领导人的严词拒绝,昆明军区也采取了强硬态度,造反派才不得不全部撤离。”党史办 P72。本文所说三条件的内容据周恩来接见记录整理。

¹ 参看1967年1月14日凌晨周恩来讲话《风展红旗》。

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 “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总理问他们还有多少人，王旭辉答：我们三百多人……

面对造反派的喋喋不休乃至胡搅蛮缠，总理已感身体难支，后半时干脆让一直坐身边的黄兆其替补上场，记录稿如此记：“我已经讲了三、四回了，我累得……同志，我请你们的代表（黄兆其）给讲几句好不好？”


黄兆其是1月8日闫红彦死事发生后被周恩来点名的上京代表，多日接触，已深得周恩来真传，今日电话长谈，他一直坐周恩来旁边，现在俨然已是总理代言人。从电话记录看得出，身伴中央的黄兆其临危不乱，应变得体，张弛有度，很有大将风范，加上同时在场的首都三司代表陈汉亦完全按照总理调子表态，事情很快将“有条件派”逼到墙角。

天已破晓，黄兆琪对最后一个通话的“无条件派”代表唐天锡宣布：“跟同志们讲清楚，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唐答“是。”黄确信当时“有条件派”没有任何能力敢与人多势众的“无条件派”抗衡，最后明确指令：“联络站怎么也不准留，如果哪一个留，你们就找他……拖出去。”

1月14日，李毅、方向东等和高仰义的“南下造反兵团”，在军区大院草坪最后一次举行大会，余下的约200人参加。高仰义再次批判了黄兆其和大联合指挥的“右倾投降主义”。李毅、方向东则宣布退出“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成立“新云南毛泽东主义联络站”，然后黯然撤出了昆明军区大院。

“新云南毛泽东主义联络站”成立一周，又改名为“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这样，云南派斗舞台的两个主角算是配齐了：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和炮兵团（简称炮派）。云南高原漫长的、残酷而血腥的派斗从此开始。

原子弹爆炸是因为核裂变释放的巨大能量。文革两派发生裂变的能量也一样，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

【综述】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启之

陕西

一、史志、大事记

陕西省志编了两轮，两轮都有大事记，第一轮的大事记在省志第一卷，从远古至今。第二轮的大事记也在第一卷，从1949到2009。后一个大事记基本是前一个的移用，只是在个别地方有所增加。但这两个大事记都在宜粗方面表现出色，比如两个大事记对斗批改中的三个全国性的清洗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都一笔带过。只有在《中共西安历史》第二卷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运动的具体“成果”——抓了多少“现反”，关押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自杀了多少，打死了多少等等。

《中共陕西历史》只出到限于1949年以前的第一卷，建政后的第二卷未见问世。在陕西下辖的十个市里面，咸阳、宝鸡、铜川、延安、渭南、榆林、商洛都没有当地的党史二卷。只有安康、汉中的党史第二卷“取得了阶段成果”，令人安慰的，是出了上下两本《中共西安历史》其中的文革内容还算比较丰实。还有一本《中共渭南历史日志》（1919-2012）（中共党史，2013）也有一些文革的东西。

在官方史志之中，与文革的关系最直接的，是方志之中的纪略或大事记一类的书——

1. 《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2004，第1643~1659页）
2. 《宝鸡地区“文革”纪略》（《宝鸡市志》附录，三秦出版社，1998，第2405~2413页）

3. 《黄龙县“文化大革命”纪略》（《黄龙县志》陕西人民，1995，页674-683）
4. 《华县“文化大革命”志》（内部版1985）
5. 《太白县文化大革命叙略》这是《太白县志》中的一章。
6. 《丹凤县“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这是《丹凤县志》的一部分。
7. 《中共留坝县委文革时期大事记》（1966.5—1976.10）内部资料。
8. 《陕西省军区1966年至1979年大事记》，此大事记是《陕西省军区大事记（1949-1990）》中的一部分，来自军区档案馆。
9. 《陕西省公安大事记（1949年2月-2000年12月）》
10. 《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65~1977）此大事记是西安交大的校史（1896—2000）》中的一部分，出自该校档案馆。标题写的截止期是1977年，实际上止于1974年。网上另有《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66-1968），也是取自上述校史，与这个大事记是同一版本。另外，还有霍有光编著《交通大学（西安）年谱（1950~1978）》（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作者是该校档案馆馆长。以及李大河《西安交通大学无线53班在校大事记》等。

二、学术研究

研究陕西文革的学者，似乎只有白磊一人。白磊的外公白瑞生文革前是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被打成胡耀邦的黑线人物，在西安七十三号关押多年。为了弄清这段历史，白磊搜集史料，采访当事人，撰写各类史学文章，虽困难重重，无名无利，仍矢志不移。

多年来，尽管发表空间狭小逼仄，其研究成果，渐为学界所知。其主要著述有：《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年陕西省武斗述略》（21世纪网络版52期）、《白瑞生与“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炎黄春秋》2014年10期）、《西安“七十三号”纪事》（《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文革时期陕西各地区造反组织派别》、《谁还记得1966年的红色恐怖？》、《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西安73号纪事》、《文革初期的

〈陕西日报〉“八·二五”事件》以及董胜利口述，白磊记录整理的《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白磊记录整理的《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等。

三、回忆、述往

在陕西的省级领导中，在任时间短，而纪念文字多的是胡耀邦。虽然胡在陕西省任职是在文革前一年（1964.11~1965.10），但仅仅一年的省委书记经历，也足以使他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制造者。因此，有不少陕西省的厅局级干部成为这条黑线的“黑干将”而遭到关押和批斗。由唐非等五人写的《胡耀邦传》的第一卷写到了胡在陕西的经历。胡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重点在胡的晚年。写胡耀邦又与陕西文革有关的，是林牧写的《胡耀邦的超前改革》一书（网书）。全书共十章，第九章“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写的是陕西省把胡耀邦等三位领导打成“三家村”的往事。

西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林在文革中长期关押，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当代中国，2001）谈到了他在西安七十三号被关押时的情况。

1965至1967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文革初被打倒，1970年重新启用，1973年5月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霍士廉没有回忆录，也没人给他写传。但有一篇来自民间的回忆性文字《霍士廉进京》（1-12），此文的作者李文斌时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此文记述了1967年7月下旬，几位西北的大学生，冒险历难，将陕西省委书记的霍士廉保护到了北京，交给周恩来派来的人的经过。

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李瑞山纪念文集》，李瑞山1970—1978年间担任陕西省委第一把手。在任期间，推行极左政策，而纪念文集却是一片颂赞之声。

1969年因支左而兼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的胡炜少将写了回忆录，下册《征程纪事续集——胡炜将军回忆录》（大众出版社，2005）讲到了陕西省的文革。因与“四人帮”有牵连。1977年被解除职务。书中用了不少篇幅说明他与“四人帮”没有关系。

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舒同，其前妻石澜在其逝世后，写了《我与舒同四十年》一书（陕西人民，1997）。书中讲到了陕西文革。

许飞青《风雨人生路》，（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文革爆发时作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财办副主任，文革中曾任延安地区财办主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

民间的回忆录，主要有——

1.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作者出身地主，1963年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1965年初因思想反动被开除。书中写到了陕西城乡的文革。

2. 白羚《小城文革乱像录》（银河出版社，2011），作者是陕西户县的知识分子。此书是他写的《涉水湾湾》三部曲的第二部。小城指的是户县。全书23万字，可以看做《户县文革史》。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莫伸有《还原历史 秉笔春秋——读白羚的〈文革乱象〉兼其他》（代序）一文。文中说此书“是对户县文革期间的种种人事所做的一个忠实而客观的记录。……白羚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他手中的笔，深入而真实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是文革——尽管他把自己的这部书冠以“小说”的名义，但这部书基本内容几乎全部是纪实。”

3. 沙苑子《陕西省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1-7）作者是196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陕西省林业学校的，1970年11月，以“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毛泽东思想、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等共计11条“恶攻”罪状，被张志栋为书记的林校党支部和宝鸡玻璃厂的驻校工宣队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农村劳动改造的。此文是作者在“文革”期间耳闻目睹的事实逐段记录下来，以供当今和后来人研究文革之用。文中全用了真名实姓。另外，他还写有《“刘总师”暴乱集团冤案纪实》等文。

4. 李百灵《文革旧事录》（网书），作者是户县工商局干部，著有《农情忠言录》等著作。此书中包括《户县“‘卫国救义军’反革命集团”假案》、《乡村哲人杨伟名夫妻自杀始末》、《文革初期户县“捍卫军”始末》等文章。

5. 杜钧福《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记忆》2012年11月30日

第11期

6. 容琳《我所亲历的“三支两军”》作者是21军61师183团三营九连的一名新入伍的战士，参加了西北国棉四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7. 付 denghua《西安交大文革往事》作者时为交大电机系66届学生，此文开头“第六部分文革往事（1966-1967在母校）”。

8. 《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作者署名“四队学员”，总字212，指的就是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此文是这个学院的文革史。

9. 王友琴《王冷之死》（王冷是西安市八中的语文教师，文革初，被她原来所在的西安市37中的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此文后面附有白磊给王友琴的信，及《关于西安“王冷事件”的部分原始资料》）。王友琴还有《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党晴梵被打死事件》、《文革中被枪决的农民诗人》（陕西户县，青年农民诗人韩佑民被冤杀）等文。

10. 石江《高墙外的“渣滓洞”——安康“文革”派性集中营纪实》，此文写的是陕西安康县1968年的两派争斗。作者时为安康中学的学生，因加入了“六总司”，在回家的路上被对立面“红三司”抓走关押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

甘 肃

一、史志、大事记

甘肃没有《当代甘肃简史》，或许《甘肃通史》的第8卷（当代卷）（1949年—1980）可以取而代之。此卷用了一章三小节的篇幅，讲述了甘肃的文革。《甘肃省志》的第一卷《概述》（甘肃人民，1989）的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也讲到了文革。遗憾的是，这两本书都太简略。

甘肃有12个地级市（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平凉、

庆阳、定西、陇南），两个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86个县。这些市县都有本地的志书。但这些志书的，有的不提文革，比如《永昌县志》，而《乌江镇志》仅在“政事纪略”中提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2卷的《甘肃省志》第一卷《概述》的第六章第三节是“十年内乱中的甘肃”，只用了五页就交待了文革十年。第二卷《大事记》内容相对多一些。文革的内容散落在《共产党志》、《政权志》、《公安志》、《民政志》等分册中。

与概述卷比起来，《中共甘肃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7）的文革部分要细得多。尤其是1966至1969年这一阶段。其细表现在对运动的发展过程有较具体的叙述，对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讲得比较清楚完整。比如为迎合北京，省委如何从文艺界入手，批电影《红河激浪》，批的过程中发表了哪些文章，迫害了哪些人等等，书中都有相当具体的描写。笔者在阅读中，发现此书的个别章节的编排有一纰露：第二节全面内乱在甘肃的蔓延，共六小节，第二小节“兰州红色长征团的组建和串连”应该与第四小节“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对调。因为，前者提到的“九三革命总部”在第四小节中才成立。

在一些县区的党史中，或可看到文革的内容，如《中共合水历史》第二卷（1949-1978）（甘肃人民，2015）、《中共兰州市七里河区历史》（甘肃人民，2012）、《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历史》（甘肃人民，2013）、《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党史大事记》等。

要了解甘肃的文革情况，最直接的是党史系统出的大事记。如《中共甘肃大事记》（1919.5-1999.12）（中央文献，2002）、《中共兰州历史大事记要》（1925-2000）（甘肃人民，2001）、《中共榆中历史大事记》（甘肃文化，2011）、《中共白银市白银区历史大事记》（1921—2014）（中共党史，2015）。

二、回忆、传记、述往

文革中，在甘肃任职的省级领导，有两个人写有回忆录：《宋平回忆录》（江苏人民，2001）和洗恒汉的回忆录《风雨八十载》。洗是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时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主任。他的回忆录比宋平的细节多，套话少。此书的第二部“十年文革”用了六章（官罢西山、军内“四大”、十年“支左”、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矛盾由来、后记）记叙了甘肃的文革，讲了作者亲历或参与过处理的一些重大的，特别有争议的事件。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省领导们也出了两种传记，其一是关于原国民党起义将军，甘肃省长邓宝珊的，共两种：《邓宝珊与陕甘宁》、黄英《邓宝珊将军传奇》（甘肃人民，2011），其二是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许发宏写的《秦岭之子——汪锋革命传记》，以及《汪锋传》（中共党史，2011）。此书的第20至22章，讲到了文革。

此外，甘肃延安老干部，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磊晚年写的回忆录《悠悠岁月》（出版单位及时间不详）也写到了甘肃的文革。作者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妇联宣传部长、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妇联主席，“知晓一些事件的发生经过，一些政策的出台过程，也可以接触到那些年月中形形色色的官员。”（王天定《悠悠岁月谁著史：读李磊回忆录随想》网文）书中有较多的细节描写。

民间的回忆之作，主要有——

1. 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作者1963年到1978年间在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书中记述了文革中发生在敦煌研究所内外的大事小情，包括，敦煌佛教石窟如何逃脱红卫兵的“破四旧”，敦煌所的两派斗争，以及所长常书鸿和时为右派的高尔泰等人的故事。

2. 高尔泰《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2011）。作者是著名作家和画家，文革时以右派身份寄身敦煌研究所。书分三卷，后两卷写到了文革时的兰州、敦煌情况。

3. 杜钧福《文革初期的李贵子事件》，此文讲述了甘肃初期，省委与造反学生李贵子在兰州的活动，李贵子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兰州大学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文革初，在甘肃省委的支持下，在兰州大学制造了70天的红色恐怖，迫害了数百名师生。另见，吕言夫《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

4. 赵俪生著《篱槿堂自叙：我的回忆录》（上海古籍，1999）。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兰

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摘帽右派”。

5. 赵旭《文革中被枪毙的甘肃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叙述了原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因同情兰州大学下放的右派师生，帮助他们创办《星火》刊物，而卷入“右派反革命案”中，先被判刑，后被枪杀的事。作者还有《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等文。

青 海

一、史志、大事记

在中共地方史书中，青海有1949年以后的组织史，没有党史。值得庆幸的是，有两部不同下限的《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一个是从1932至1990年，是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1990年的内部出版物。另一个是从1932到2010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在青海的一市（西宁）六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之中，中共党史系统出了三种四本大事记，一是《中共西宁历史大事记》（1929-2007）、《中共西宁历史百件大事》、《中共海北州藏族自治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0）（中共海北州委党史研究室1999）、《中国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历史大事记》（1949.08~1999.12）（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此外，还有化隆回族自治县党史办出的《化隆党史大事记》（1949—2009）。

青海方志方面的成果比省党史办多得多。81卷本的《青海省志》包括综合志、特色志、专业志。其中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是《青海省志·大事记》（青海人民，2001）。此外，《西宁市志》（陕西人民，1998）、《玉树藏族自治州志》（三秦出版社，2005）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出版社，2001）之中，也都有《大事记》。此外，还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事记》（1954~2014）（青海人民，1900）、《海南藏族自治州大事记》（从史前至2013）（青海人民，2015）。

如果想知道官方对青海文革的看法，陈云峰主编的《当代青海简史》（当代中国，1996）应该是最简易方便的选择。研究青海文革的民间学者，对这本官史的观点不是会认同的。

尤其是它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叙述和对刘贤权的评价。2014年，民族出版社出过一本张生寅，杜常顺写的《青海历史》，此书的最后一章提到了中共的建政。全书以五十年代平叛结尾。

二、学术研究

全面研究青海文革历史的民间学者，唯孙言诚一人而已。孙先生是复旦大学六十年代初的史学研究生，九十年代从齐鲁书社社长任上退休之后，即投入文革，二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资料，著有多篇专业文章。2016年4月出席德国科隆大学“文革地方史国际研讨会”。他对青海文革有独到的研究，2009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青海二·二三事件》一文（第10期）。

青海“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的大事件。对青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重大影响。研究这一事件的文章很多，如：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赵淮青《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洗恒汉回忆录补正》（《华夏文摘增刊》649期，2008）等。

对惨死于文革中的原青海省长王昭的评价，是学界关心的话题。尹曙生的《青海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一文对王昭及时代政治有深刻的分析。青海党史办出的两卷《王昭在青海史料集》（内部，2008）是研究青海文革史的重要书目。

民间文革研究刊物《昨天》出过两期“青海文革专辑”（第55期、第70期），刊出青海文革的文章15篇。

三、回忆、述往

1. 王仲方《炼狱》（群众出版社，2004）作者1961年5月起，先后任青海省省委秘书长、省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青海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此书是他的

回忆录，讲到了青海的文革。

2. 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自印书，2010）。作者1966年5月随丈夫王仲方调到青海，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文革中，因曾在罗瑞卿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此书是她的当年写的日记。

3. 尹曙生《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他还有《金银滩之痛》（《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等文。

4. 《雷一宁专集》（《往事微痕》第23期，自印书，网络发表，2009）。作者时为青海某中学的教师，“摘帽右派”。书中写到了青海文革。

5. 孟犁野《士之殇》（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12）作者时为青海省话剧团编剧，“摘帽右派”。书中写到了青海文革，包括赵永夫及“二·二三”事件。

6. 聂树人《青海地质五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者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地质《东方红》的第二把手。此文写的是他在青海的亲身经历。

7. 王菁珩《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炎黄春秋 2013年7期）作者时为二二一厂厂长。

宁夏

一、史志、大事记

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2002）、《中共宁夏史1949.9—1978.12》（宁夏人民，2008）和《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宁夏人民，1991）在记述宁夏文革史方面各有短长。《当代宁夏简史》的可取之处，在“点”，如1970年宁夏地区“一打三反”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此书有较详细的记载。《中共宁夏史》的可取之处在“面”，如《当代宁夏简史》一笔带过的“干部下放和五七干校”、“批林整风”、落实干部政策等专题，《党史》记述较详。《当代宁夏简史》忽略的“革命大批

判”、“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备战”“整党”等内容,《中共宁夏史》都辟有专节。《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的文革部分,按照官方的“三阶段”说,对宁夏文革史上的大事做了记录,但其惜墨如金,在重大事件上常常语焉不详。如:1967年3月18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6月19日:“宁夏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8月28日:“青铜峡县两派群众斗争十分激烈,康生向部队下达命令;开枪武装镇压所谓‘反革命叛乱’”。这种“大事记”记其表略其里:“总指挥部”是由哪些组织构成的,其基本观点是什么,与军区的关系如何?石嘴山和青铜峡的武斗,发生在哪些派别之间?武斗的原因是什么?都被省掉。

宁夏下面有五个市,其中银川、石嘴山、固原三个市有包括文革时期的大事记。¹五个市下面的14个县多数没有这种大事记,即使有,也记载极粗。如《中宁县大事记》(1958—2007)的文革时期,1966—67年没记一事,从1968年才开始记事,且每年仅一两条,每条不足百字。《海原大事记》(1958—2007)文革时期1967—69、1972—74阙如。相对而言,《中共彭阳县历史大事记》(1932—1997)(宁夏人民,2000)和《中共青铜峡历史大事记》(1925—2001)(宁夏人民,2002)略好一些。

有一些党研室或方志办的专业人员写的文章可视为对上述史书之粗简的丰富补充。如:芦学舜《银川红卫兵运动述略》、《银川市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简述》,陆维成《“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的“斗、批、改”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曲折发展的银川经济》(作者不详)等。

二、独立研究


关于宁夏文革的独立研究者很少,就笔者所见,只有武丽丽、赵鼎新撰写的《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总第101期。此

¹ 《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1949.9—1996.12》(宁夏人民,1998),《中共银川历史纪实:1949.9—1978.12》(宁夏人民,2012),《中共石嘴山历史大事记》(1921—2010)(宁夏人民,2011),《中共固原地区历史大事记》(1932.5—1992.9)(宁夏人民,1998.6)。

文又名《“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武斗的起源》）一文。作者考察了1966—1968年宁夏的文革，“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地方官僚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答”为什么毛“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甚么？为什么文革必然会把中国迅速地引向灾难？”等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宁夏文革的兴衰，说明毛用群众运动来打压科层的意图败北，毛可以发动文革，运动群众，但是，他无法阻止新生的革委会和两次军管的科层化，更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例行化。洞察了克里斯玛与科层组织关系的韦伯战胜了毛。

三、回忆、述往

1967年7至8月间，宁夏三派四大群众组织之间，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武斗：石嘴山市武斗（6月19日），银川市西塔武斗（8月1日），永宁县大观桥武斗（8月8日），吴忠县城武斗（8月13日），也发生过军队开枪镇压对立派别，造成104人当场死亡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成为回忆录和纪实文学的重点，如：《洗恒汉回忆录》中谈到的“青铜峡事件”，余汝信《“青铜峡事件”述略——洗恒汉回忆录补正》，郭振伦《宁夏银川市“八一”攻打西塔事件》、《宁夏平罗“八·二九”武斗》，郭振伦、余习广的《宁夏吴忠“八·一三”大武斗》，余习广《1967：宁夏银川八·三〇“掌政桥之战”》以及笔名摩天岭岭之鹰的《宁夏永宁伏击战》等。

宁夏从1968年的“反四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到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制造了多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如“赵延年反革命集团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这些冤案成为独立学者和民间撰述的重要内容，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的“一打三反”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章节中，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有专门的叙述。另外，还有《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与吴述章》等文。

【资 料】

二 • 二三前后青海省无产阶级大革命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二十八日）

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八 • 一八革命造反派闻讯前往军区报喜。

青海省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常委会，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讨论部队支左工作，决定支持以八 • 一八为主体的革命派。会后，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宣布“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八 • 一八革命派”。反革命分子赵永夫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在党委会上同意支持八 • 一八，一面在会后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刘贤权同志，并鼓动、操纵受蒙蔽群众，搞什么“造反”，对刘贤权同志进行残酷打击。篡夺了军权，立即宣布撤销了军区党委关于支持八 • 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决定。

同日，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八 • 一八革命造反派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了广播电台大权。这是继《青海日报八 • 一八》新生后的又一伟大胜利。

元月二十四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篡夺军权之后，以军区机关造反派之名义，抛出了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的所谓搞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紧急倡议》。自此军区门口，车水马龙闹若街市，“保”字号组织的头面人物川流不息，进行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接头工作。从此，反革命分子及其追随者便和社会上“保”字号组织秘密勾结在一起了。

青海省公安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保守组织，在厅内进行了假夺权真保权的勾当，阴谋掌握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元月中下旬：在王昭严密控制下的省委机关干部相继杀了出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派等革命群众组织。

元月下旬：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我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在许多基层单位先后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元月二十五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假冒革命党委之名，邀请驻军各部队负责同志开会。这次会议赵永夫、张晓川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便紧紧地勾结起来了。随后这一对混蛋，便策划于秘密之中，煽风点火于群众之中，开始策划反革命政变，

元月二十六日：捍卫队调来的大批湟中、大通等地农民集聚西宁宾馆两三天，严重影响备耕生产。红宣兵派人去宾馆向农民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精神，动员农民回乡生产。但捍卫队中某些反动头目不但不接受正确的宣传，反而挑起武斗，下午红宣兵宣传车载首都三司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去军区要求处理此问题，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仇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不仅不热情接待，设法解决问题，反而给他们扣了一顶冲击军区机关的大帽子，挑动不明真相的指战员围斗整个红卫兵。他们的举动已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元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三司红卫兵驻宁联络站反折衷战斗队给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贴了大字报，批评他们搞折衷，和稀泥，抹光墙。下午鲁迅硬骨头队红卫兵也贴了批评他们的大字报。自此，“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调转枪口对准他！”等等大字报，巨幅标语雪片似的飞去，贴满军区楼前院子。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非常仇恨贴这些大字报、巨幅标语的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他们除煽动不明真相的指战员围斗贴大字报和巨幅标语的人而外，还派人拍摄，记录这些大字报标语，企图以此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元月二十九日：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等四十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初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当天在西宁市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青海省革命造反派夺权大会，宣布夺回省委、省人委党、政、财、文大权。会上万众一致通过《给毛主席地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会上，八·一八革命派还愤怒声讨了苏修领导集团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地滔天罪行。

元月三十一日：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主办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出版创刊号。首都等外地红卫兵通过大串连给我省文化大革命以极大地支援，特别是在为“六·三”“社论平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的出版，以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尖锐泼辣地风格，有力地鼓舞了我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二月三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昭和张晓川之旅，经过密谋策划，配合“捍卫队”、“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东方红公社”等保守组织，举行了“二·三”大游行，把斗争矛头指向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拉开了大规模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地反革命序幕。

军区以刘贤权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立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省公安局八·一八红卫战斗团、一〇·二七战斗兵团等革命组织的革命战士和红卫兵小将冲上街头，面对着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地武力恫吓，义正词严地揭穿了大游行的反革命阴谋。

当天晚上，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先派代表找军区谈白天游行的问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追随者不予理会。后八·一八等群众组织，首都、外地红卫兵也来军区辩论，同样不予理会。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动宣传车广播《在调查研究后面》《敦促青海军区立即选择道路》等文章，冒犯了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他无理扣押代表，挑起群众冲入军区院内辩论。他见革命群众上了圈套，吹响了紧急集合号，说什么“反革命冲击到军区机关”，调来了大批指战员，包围了院内的革命群众；而

且把门外的同志，甚至看热闹的群众赶了进去，进行打、骂、围斗。首都红卫兵赴宁造反纵队战士荆起，就是当天晚上挨打受伤而住院的。

二月五日：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召开了数万人大会。会上，革命造反派表示决心相应毛主席的号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这是誓师的大会，是向反革命逆流示威的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月八日：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右派衣竹林为首的公安厅保皇派，从人民医院，逮捕了毛主席的红小兵荆起。并公布了捏造的罪行，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月十四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勾结王昭、张晓川之流，宣布对新生的《青海日报》实行非法管制，妄图扼杀新生的《青海日报》，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喉舌，并进而对全省以八·一八为主体的革命造反派实行进一步迫害。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为了对新生的《青海日报》实行非法管制，在这前几天，就撕下了遮羞布，赤膊上阵，使尽了各种威逼手段，造谣惑众，说什么“八·一八的大方向完全是错误的”呀！“新生的《青海日报》错误严重”呀！“二月七日《青海日报》四版上的宣传画有‘造毛’‘抓林’的字样”呀！等等。他们完全是凭借造谣的卑劣手法，来蒙蔽群众，煽动群众，为其非法接管新生的《青海日报》、镇压八·一八革命派，大造反革命舆论。

革命造反派不可悔，革命造反派没有“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他们遵照毛主席“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的教导，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新生的《青海日报》！

成千上万的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二月十四日开始，昼夜守卫在青海日报社，哪怕敌人恨得把牙咬掉，尽管他们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新生的《青海日报》依然

掌握在八·一八革命派手中，且从未间断地照常出版，宣传毛泽东思想，报道八·一八革命派不怕阶级敌人的围攻，勇敢战斗的英雄事迹。这就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保皇小丑的臭威风。

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昭之流，看着新生的《青海日报》继续出版，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于是，他们在围困报社的同时，一面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搜罗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继续对“八·一八”和新生的《青海日报》进行造谣、污蔑和栽赃，为把“八·一八”打成反革命制造舆论；一面指使其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对“八·一八”的基层组织，实行空前未有的打、砸、抄、抓、抢，搞得西宁市“黑云压城城欲摧”，妖雾阴云四起，一片白色恐怖。

一边要强夺，一边要坚守，八·一八革命派保卫新生的《青海日报》的英勇斗争持续九天九夜，直到二月二十三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屠刀砍向“八·一八”，制造了“二·二三”反革命大屠杀事件为止。

从二月十五日起火车头、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捍卫队等，调动人马陆续举行了支持“军管”报社的游行，规模一日比一日大，这些天街上若有人说个“不”字或说“八·一八”是对的，必遭围攻和毒打，白色恐怖笼罩西宁市。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技工学校红卫兵到军区门口散发传单遭到围攻。引起了冲入军区院内的事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追随者。调动汽车、部队堵住大门，将60名红卫兵扣留，强迫他们承认冲击军事机关。年青的闯将，不畏强暴，排成队提抗议，朗读语录，唱语录歌，坚持斗争，饿狼似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强迫红卫兵站在院中，任凭寒风吹打，不准离去。午夜技工学校革命群众送来了被褥开水等物，红卫兵只好住宿在院中。黎明时刻，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及其少数追随者见达不到目的，便下令部队将他们撵出门外。

二月十九日：正是反革命分子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八·一八革命派毫不屈服，毫不妥协，十余万人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彻底打垮我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在这个大会上，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表示了坚决和王昭、赵永夫之流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报社门口时，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唆使保守组织破坏游行，多次冲乱游行队伍，制造流血事件。接着，他们便借所谓“张桂兰事件”大造其谣，颠倒黑白，用死人压活人，为镇压八·一八革命派作反革命舆论准备。

二月二十日：东方红医院的捍卫队，在一小撮铁杆保皇派的操纵下，按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张晓川、王昭之流的意旨行事，抬着张桂兰的尸体搞游行，大造镇压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的舆论。游行队伍经工农兵医院（中医院）时，工农兵医院文革筹委会请他们头目辨明真相，而一批保皇分子，冲入工农兵医院，逮捕了中医院文革筹委会的五个成员，推的推，打的打，押到了公安厅。

二月二十一日：青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近十万人，（有工、有农及各行各业的人员）抬上张桂兰的尸体，举行环城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到那，那儿的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办事机关便被砸、被抢。街上有人说个“不”字或说“八·一八对”便被抓入游行队伍，捆打一阵后押走。

二月二十三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等从早晨八时即宣布西宁市全城戒严，并新调来大批人员层层包围青海日报社，于下午二时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手无寸铁的守卫报社的八·一八革命派和毛主席的红卫兵狠下毒手，进行了血腥镇压。与此同时，分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还包围了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许多基层组织所在地——青海毛纺织厂、人民剧院、青大畜牧兽医学院、青海省委党校等处。并在全省各州县开始对革命造反派的全面大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惨遭毒打，大批八·一八战士横遭迫害，被捕入狱。

在赵永夫之流的屠刀下，八·一八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不少同志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不少同志面向东方，满含热泪，高唱战歌，被捕入狱。他们实践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钢铁誓言。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卧熊。”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二·二三这一天，红一师红卫兵小将，高举战旗，挥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喊着“毛主席万岁！”“八·一八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青松不老，八·一八不倒！”“和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革命口号，继续走上街头，大量散发革命传单，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大长了无产阶级派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二月二十四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对青海民族学院八·一八、十·一红卫兵进行血腥镇压，再次制造了严重的流血惨案。

二月二十五日：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张晓川、王昭之流，为了蒙骗群众，遮盖其反革命罪恶，巩固发展反革命政权，捏造了林副主席的假电话，直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火。妄图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八日：在这一个多月里，白色恐怖达到最高峰。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受到残酷镇压。在监狱里，革命同志受尽了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在医院里，负伤的八·一八战士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有的竟被披着白衣的豺狼残害致死；在各个工厂、机关、单位、学校、农村，保守组织反动气焰异常嚣张，对革命造反派大打出手，捆绑、吊打种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黑牢关不住热爱毛主席的红心。肉体摧残愈加坚定了革命战士的斗争意志。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


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用战斗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监内监外，都执行着黑指挥部的黑指示，要强迫革命群众承认有枪，有黑名单，企图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置革命群众于死地。

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造反派心连心。玉树州歇武地区驻军在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中，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八·一八革命派，他们在战斗中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坚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在前头。”

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最支持革命造反派。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于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三日分别接见了我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以及赴青外地红卫兵，听取了汇报，研究了青海问题。

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再次接见我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以及赴青外地红卫兵，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青海问题的关怀，并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从根本上扭转了青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使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三月二十八日：一声春雷，驱散了一段时间笼罩在青海高原上空的迷雾阴云。毛主席、党中央给八·一八平反的特大喜讯传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青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各族革命的工农兵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满含热泪千遍万遍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选自青海省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编：《青海八一八战斗史资料选辑》

【文 摘】

视野、境界及其他

——治学杂谈之二

赵 园

较之上一篇，本篇讨论的，是一些更“虚”的方面。有务实/务虚的说法。“以学术为业”者固然有必要考虑一些不惟关系学术成果而且关系学术境界的方面，其他接受学术训练者，也不妨功利而又非惟功利，以便由学术经历中更充分地、多方面地获益。

视 野

学术史的视野对于学人至关重要。学术史的考察不仅是从事学术工作前的必要准备，还应当是日常性的学术工作的一部分：每一项研究、甚至每一个具体工作环节，都以有关方向上的学术史调查为基础性的工作，这样才不致于“横空出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与课题有关的调查，意义至少在避免重复劳动；更积极的目的，则是确立属于你的前提、起点，以便与已有的研究构成对话关系。学术工作中何为“创辟”？并非没有人说过的就是。学术的演进赖于积累——无论“学术界”还是个人。意识到这一点，有利于保持上一篇所强调的“限度感”。当然，学术史知识所提供的参照，还有助于形成你自己的学术进路，尤其在被认为“学术转型”的关头。钱穆、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写在转型时期，至今仍为学人“入门”之所资。

凭借学术史的视野便于自我定位——不止于选择在一时期学术格局中的具体位置，而且选择与前此的学术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有严重意味的选择。为人熟知的《兰亭序》中有“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云云。将自己的学术工作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中，才可能有自我审视的清醒。比如说，不会用了衡文的尺度衡量学术，满足于将学术当文章做，以辞采

华丽自喜。文体、修辞对于学术绝非无关紧要，评价学术却仍然另有标准。那么就有必要问何为学术，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缘何确认。

传统的学术史体裁，“学案”之外，另有“学谱”、“师友记”等，均意在清理学术渊源，呈示所涉人物的为学次第，成就一个学人的诸种条件。有志于学术者读一些优秀学者的“学术自述”、“学术传记”，会大有裨益，有助于开启思路，尤其在需要作出选择的关键时刻。那些“学术自述”、“学术传记”中有个性化的学术史，更与一个生命血肉相连的学术史。由此不但可以“取径”，也可避免重复某些失误。“为学次第”（为学的顺序、步骤），属于治学的初阶，却有可能决定了你最终抵达的边界。你当然愿意“取法乎上”，但你先要确定何者为“上”。此种判断对于你的学术工作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的学术史著作，就大有助于学术判断力的培养。

学科史的清理，是具体的学术史工作。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曾重视本学科的学术批评。作家研究述评、年度研究述评，不但强化了这一较为年轻的学科的学科意识，且为学科史的梳理进行了积累。但在学术大全景中估量学科，却始终显得薄弱。学科史的考察本身也赖有视野，即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大学术的视野有可能避免狭窄的专业眼界，“专业人士”所不免的固陋。“文学研究”不是一种专利，尤其不是专业人士的专利。你在具有其他专业背景的智者那里，会读到更富于深度的文学分析。我范围有限的阅读中，就注意到了当代哲学家、思想家的文学解读。他们取径不同，有各自的读入方式，却证明了文学艺术（如小说、电影）的阐释的可能性。正是为了研究文学，你有必要向其他知识领域、学术门类汲取灵感。五四时期有所谓的“为人生的文学”。文学正因关涉的是边际不明的“人生”，对它的深入如同对“人生”一样，需要动员全部经验与智慧；而经验与智慧不都是依学科、专业划分的。

不限于文学研究的20世纪学术文化，应当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要的知识背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却往往缺少“学术”这一维。那一时期的优秀学人未必“与时俱进”。他们中有些人坚持的是自己的知识立场，而这也正是清理新文化运动所

应面对的内容。即如我曾一再提到的孟森，不止与“时代思潮”保持距离，且对那“思潮”持批评态度。其《八旗制度考实》有针对性地说，“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页205—206）关于自己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陈垣来往书信集》页8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说的是该项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包含其中的与同时代文化运动的“对话关系”。陈、孟的文化立场与学术取向显然不同于“新文化者”，却也正可以证五四之后尚有较大的学术空间以“兼容并包”。学人的上述宗旨、姿态，直接或间接地出于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应，参与构成了“新文学”的外部环境。古代中国人强调知人论世。研究文学史不可不知其时其世，研究学术史也不可不知该著述所针对的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生往往有与“价值”、“意义”有关的困惑。在那篇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说，“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学术与政治》中译本，页27，三联书店，1998）如果目标在“传世”以至不朽，对此自然会失望。韦伯却说，“过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你的“成就感”不妨来自参与了学术文化的积累。问题是，你是否确有贡献于此种积累？

学术史的视野包括了回顾也应当包括前瞻，因此不妨同时关注“前沿”。前沿不是在新/旧的意义上。“前沿”非即“新”。但每一时代最生气勃勃的学术，往往是由未获得某种地位、盛名的学者做出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曾经有“创新”的误区；其时的所谓“出新”，有时即刻意立异。但九十年代以降的这一学科，给我的印象，似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了无关涉，缺乏资源的共享，也失去了对前沿性话题的参与能力。我不认为学术有必要“与时俱进”，但也不必画地为牢。

学术史的视野中一向有“学派”。“学派”以至“门派”可能有利于推进学术，我却以为宜慎言“传承”；甚至有必要打破“师承”这一眼界。学术史的清理也不必即以本人所声称的师承为依据。不妨尝试在尽可能复杂的“学术文化环境”、“思想网络”中理解承传。学术史家说黄宗羲的理学承自刘宗周，又说其人的另一些学问承自黄道周。无论思想抑学术，承启都有可能线索复杂；所承或更是“时代思想”（杂糅），甚至不明所自。何不对“脉络”在宽广的范围内搜索？所谓“思想史图景”、“思想地图”，相当程度地赖有想象与联想。“章门弟子”中，据说黄侃、吴承仕等人最得正传，有人却说，正因了若即若离，不以正宗自许，也不以护法自任，周氏兄弟对其师的承继才像是别有会心。读鲁迅记章太炎，其人对其师的理解，未必章氏被公推的高第弟子所能及的吧。

我自己不热衷于认祖归宗，也不大看重太具体的“承传”。有师承而没有门户之见，不以“门派”、“家法”自限，也不以学科、专业自限，转益多师，这一定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所乐见的。读到过赵俪生对王瑶及“王门弟子”的批评。一个学人在何种基础上起步，相当程度地决定了你可以走多远。较之前辈学者，我所属的一代人在学养方面的缺陷最显而易见。这些年中，整体知识水平有升有降，不可一概而论，但降的方面，缺口的确难以填补。进化中的退化，发展中的流失，本是文化演变中的常态；我们所遭逢的“文化革命”与市场化，却均非常态。在这过程中流失的不止学问，更是一种治学态度，学人的品性。在我看来，一代人会有名家名作，甚至所谓的“传世之作”，却不可能有大学问家。有惟我辈能写的著作，但“独特”并不即可言“大”。当然，也不必以“大学问家”为目标，否则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吧。

反思作为态度与能力

陈平原在他的学术史课上，要求研究生为“前辈学者”写学术评论，我因此读到了年轻学人关于我的学术作品的批评。看到年轻人将我自我反省的文字排列起来，不免暗自惊

讶。自己写过的，有些已经淡忘了。鲁迅说过“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一卷，页65）；还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十二个〉后记》，同书第七卷，页300）我们的确有必要随时站了开去，审视自己与自己的学术实践。反省，检视也是一种能力，不但影响治学的境界，也影响人格的养成。人难免在“风气”中，反思的态度有助于避免风气的锢蔽。当然，反思有不同的层次，所及的深浅更有因人之异。¹

有必要审查、省视影响我们的学术工作的所有因素：环境的，风气的；制约了你的学术工作的内外条件，包括传统的与流行的理论、概念工具，你进入一项研究时的基本预设；有时还包括你的学术立场（以及所选择的“位置”），具体的工作方式、操作规程，以至所使用的文体——使你的论述得以展开的所有意识到了的条件。反思还应当包括另有何种可能的方式、可能的视野，等等。这里关心的不是简单的对/错，不是二者必居其一式的路径选择，值得追问的，是某一路径绕过了什么，以及还有何种可供选择的路径。意识到我们赖以进行学术工作的条件，我们所不能摆脱的诸种制约，并不注定了会使人丧失自信。

即如对于《想象与叙述》一书所涉论域，无论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还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都有必要追问，我们所获取的有关知识与印象，是赖有何种叙述、言说而生成的？政治史叙述、意识形态诠释、文学演绎各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我们对诸多材料删除、选取、粘连拼接时，参照了何种先在图景？上述问题并不总能弄清楚，但“存此一种思路”，在我看来极有必要：有助于保持“框架”的开放性，维持研究中必要的张力。我们在事实上既受制于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流行且强势的意识形态，又受制于“正史书法”，诸种史学惯例，受制于自己时代普遍的认识水平，学风以至文风。我们只能在严格限定了的条件下、极其有限的路径间选择。甚至纵然我们希望、也难以知晓制约我们

¹ 写作《想象与叙述》一书期间，参与了我的几位老师发起的活动，为他们年轻时共同编写的一本关于新诗发展的书寻求反思的视野与方式。他们运用了一种特殊的著述形式，即将早年所写文本置于其中，而以回顾、批评为基本线索。作者之一的洪子诚先生在为该书所写前言中说，“‘反思’主要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不是站在对立位置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参照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这些条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回顾一次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的全部因素；但意识到“制约”与对此浑然不觉，是大不一样的。

学术史知识有助于形成对于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反思态度。最明智的选择基于清醒的自我认知——关于自己的可能性与限度。丰厚的学术史积累，高大的难以逾越的前人，富于才华的同时代人：你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意识到这一点未见得会造成压抑，却有助于保持自我评价时的清醒，与选择时的冷静。优秀的、有典范意义的学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有典范意义的学术作品，虽不能至，不妨心向往之，以此打破师徒授受的狭小格局。依我的经验，最不可救药的，是不自知其不至，也就无此向往，终其一生而不知学术有可能达到何种境界。不妨问问自己，你是否有感受冲击、震撼的能力？如果你不曾有一次或几次被别人的研究所震撼，感受到强大的冲击，因而产生对自己的学术水准、境界的怀疑，那么你有可能终于不能真正地“进入”学术。震惊的经验，自我怀疑的经验，是有益的。有的人像是“先天地”缺乏此种能力，不能察觉距离，认识差别，也因而不能从别人那里受益。“学术自觉”赖有反思。在我看来，不对自己的论述“坚信不疑”，是一种较好的心态。你有可能随时准备着质疑、校正，至少是丰富、补充。

经验、经历之于学术

既然不可能真的“空着双手进入历史”，那么你选择“进入”时的知识状况与经验、经历，你在生活中业已形成的敏感与关切，就至关重要。经验——严格地说，是经了反思的经验——肯定是一个学者极其珍贵的东西，不但有可能造成学术工作的独特取向，且有可能使学术作品浸染个性魅力。但经验的意义仍然有因人之异，只能联系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说明。而由经验、经历到学术，其间有诸多中介，作为过程难以追溯，更不必说完整地呈现，尽管诸种学术自传、学术传记，以及师友记等等，均以查找、呈现此种线索为一部分目的。即使创作，更直接地以经验、经历为底子，那经验、经历也经了记忆的筛选以及文体、修辞方式等等的改造，而不再是它们“本身”。我之所以不试图解释一项研究的

“缘起”，也因了解释的困难。你的全部既往——经验、阅历、知识与观念——都有可能参与了一个具体时刻的学术选择。

我所研究的明清之际，正是那一段“遗民心事”、遗民所选择的生存之道，使他们的著述在精神上与清代学术（通常以乾、嘉之学为标志）区别开来。无论梁启超还是钱穆，都强调这种区别，强调掩蔽在文字、著述间的精神意气的不同。这种不同，非学究式的学术史考察所能察觉。于是你读出了梁、钱文字间涌动着的激情。值得敬畏的，就有前辈学者读学术的方式，即如从中读出精神意气以至世道人心。“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由此也可证所谓“学问”，与世事本非两件事，只是“学者”将它们作成了两件事而已。

由前辈学人看，人事历练的有助于学术，是无可怀疑的。陈垣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孟森也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相信他们与政治有关的经历、经验，与后来所专精的学术，决不会无关。那些活动对于他们的意义，当不止于阅世，而是暗中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取向，从事学术的志趣与旨趣，至少影响了他们面对中国历史时的态度。更不必说稍前的章太炎。鲁迅以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自己当年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页545、546）。学者与革命家，两种角色、身份，两方面的活动，未见得相妨。古代中国有所谓的“粹儒”。成“粹”的条件，想必是去除杂质。我所研究的明清之际，被指为“粹儒”者，往往乏味。张履祥即一例。学者也不必求“粹”。即陈寅恪，又何尝是纯粹的书斋动物！在我看来，《柳如是别传》就足证其人的深于世故。（当然，如若确能“粹”，应当算得当今的珍稀品种的吧。）我相信学术之外的活动不但有可能不妨碍、且有助于“成就”一个学人。尤其没有必要为求“粹”而“去政治”。就学术研究而言，人物的政治性存在不需要特殊关注，也不必刻意回避——尤其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明清之际。学人、学术与自己的时代——政治是重要的一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副标题即“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可见政治、政治文化在其所呈现的

“历史世界”中的分量。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所面对的，的确也更是政治视野中的“明清之际”，这种视野并非与其他视野不相容，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有必要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读书》杂志开设过一个栏目，“文本内外”，维持的时间不久。我猜想因了稿源不足。这里的难点或在“内”“外”间的连结。对于文学研究者，“文本细读”不止赖有工具，也取决于能否深于人事，体贴人情；工夫不止在推敲揣摩字句，也在能否读入文字间的空白处，读出文字之外、文字背后。这样看来，“文本内外”的“外”就限于背景材料、“相关链接”，也并非就是“本事”，还包括了文本间接透露的信息，要求凭借人事经验，经由想象力捕捉。高明的专业读者有可能以其解说弥缝空缺，将作者所不言者形诸文字，使“空白”可视可听，甚至发展出更为复杂丰富的语义空间。在这种读解中，内、外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不清。

凭借20世纪知识分子经验的特殊性去读古人，会发现古人与今人并不真的那么相远。你与古人、古代知识人确有可能心意相通。你的经了反思的经验、经历，有助于你读人——那人那心事，确也在文字间，有待于后人辨认。钱锺书曾批评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但由诗读人则是另一回事。不妨说，任何表达都可以作为读人的材料，包括粉饰，以至作伪。

我相信阅世阅人有助于读史，却以为对“经历是财富”这种流行的说法，须作限定，即如经历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财富”，有可能成为“财富”。我尤其不能苟同于将“苦难”合理化，以至诗意化。不止我所属的一代，因连绵的“运动”更因“文革”而荒废，有了诸种知识以及训练方面的缺失，上述说法不失为安慰，可以据此相信“命运”尚有公正：你的“经历”以至“苦难”得到了补偿。我却宁愿年轻的学人没有那一种经验，也不必凭借那一种经验。他们自有经验，而区分在于能否思考。经历只对善于思考、有反思能力的学人有意义。

唐顺之曾说过，“学者非无痛痒之为贵，而以真知痛痒为先”；“今之学者，病在遍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与蔡子木郎中书》，《唐荆川文集》卷四）。当然唐氏所谓“学”指学道，非即“问学”；所说“学者”，与本篇所指不同。但以为“学”应切身，

于今之所谓的“学人”，是否也对症？学术可以不直接面对“社会”“时代”，但学人不可不有此关怀（亦一种痛痒相关之感）。在我看来，这关系到“学”的内在品质与境界。

我在台湾友人主编的集刊《思想》第二期上，读到陈正国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生活意义与工作的分离，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人文也往往也变成只是一项工作。而且相较于其他行业，它是很没有经济生产性的工作。这种结构性的专业化，反过来加强了人文学者的自我异化。人文的精湛表现方向，越来越倾向在绵密的注脚、考证、版本的比对上；简单说，就是现代的经院学风上。”“人文学的衰落的最深刻的表现，就在对价值的不可、不能、不会言说；简单说，就是深刻思考的缺席。如果某个民主社会主导价值议题的人常常不是人文学者，那这不是别人的错，而是人文学者本身的问题。”（语见该期页248、25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当然，在我们这里，问题有更为复杂的性质。但人文方面的疾患是具有传染性的；该文所说的“民主社会”中的症状，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前现代或“向现代”的中国，不是也提前呈露出后现代文化的病象？

我曾谈到明清史研究中的“立场”问题。我自己也体验过对象诱你作立场选择的那种情况。我的体会是，过分“投入”与局外态度各有其弊。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力避影射。不影射不意味着忘情。对现实发言本可以有多种方式。我确信经验、经历与现实关怀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我的学术工作。知识者与学者的角色并非不相容，对学术价值的追求与现实关切并非不相容。当然，现实关切不应当被作为贬低学术、学术性的借口，“知识分子使命”不足以也不必用作贬抑“学人”的口实。这里并不适用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估量。古代士大夫有“儒者”、“文人”等角色，不妨一身而二任；以至兼有“官员”这一种身份，并不以为会导致人格分裂。学术只是人生中之一事，学人也只是一种身份，无妨于从事他事（如社会考察、社会批评以至对政治的参与、干预），具他种身份。但对学术、学人，固有评价尺度，不因他事、他身份而有不同。

至于以学术“参与”、“干预”，则关涉学术工作者的职业伦理。在上文所引韦伯的那篇著名演讲中，他说：“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

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听到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术与政治》中译本，页37—38）对此我想到的是，学者的确需要自律，却也有必要警惕过分的自律，以至将某种他律内在化了。

学者的学术工作与其他社会实践，他们的现实关怀与作为学者的职业伦理、从事具体研究的工作伦理，20世纪已经有了不少大知识分子的示范。至少可以相信，学术所要求的深度思考，有助于磨砺思想，使对于“社会”的认知深入。如果再考虑到学术工作对于人格的滋养，那么这种活动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人的积极意义尚不止于此。由此不难想到学术工作的作用于学人自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人/为己，是我不厌重复地提到的话题，涉及从事学术研究的目标意识。以自我完善为目标，在我看来，与干预、参与也不相妨。它们都区别于“为学问而学问”，由不同角度回应了“价值议题”。中国的士大夫的传统中，从来有道德的自我修养与事功追求两面的平衡。反求诸己，并非总是无奈的选择。我曾分析过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与“自靖”，后者即尽其在我，求心之所以安。将“自靖”作为目标，也才能“知不可而为”。可惜的是，这一种传统，已被当代知识人所废弃。在市场化的空气中追求自我完善，难免要被一味讲求实用、功利者视为迂阔的吧。

上一篇谈到了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诸种能力的均衡发展，这里要说，这种均衡也正有助于造就健全的人格，较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能力，无不属于人的基本能力；为学术工作所要求的素质，也应当是人的基本品质，都关乎人格的养成，人生意境的营造。古人好说“作人”，说“兴起”、“长养”人才，在我看来，坚韧，勤勉，深沉凝重这类品质，就有可能在“治学”这一种职业生活中养成。事实是，你的每一项研究都可能有助于自我开发，包括发现自己的潜能，前此未被认识的可能性。经由对象发现自己，经由学术提升、完善自己——也既功利，又非惟功利。甚至关心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动机，也不妨在自我完善：何不给自己的活动以更广阔的空间或背景？

与此相关，做学术者难免为学术所“做”。你的这份职业不经意间浸染了你的人生。当然任一职业都会作用于从业者，只不过作用的途径与抵达的深度互有不同而已。即使仅以探究学问为目的、以学术自身为目的，对学术持纯粹的职业态度，也仍然不免于被塑造，承受你所从事的活动的后果。你与研究对象、与你的学术活动彼此作用，相互“进入”；你与更广大的“外在世界”的联系也赖有此种“中介”。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从业者不妨有此自觉，作为“反思”的一部分内容，以便保持自我审视的清醒。

我自己所体验的学术之于人生，其意义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你的世界有可能被你的学术工作扩大的同时被缩小。你因过分专注，失去了对更广泛的问题的敏感与反应能力。我曾一再提到“代价”，其实并不曾深究，比如在有所收获的同时，究竟放弃了失去了什么；如若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不免于残缺，那么我所选择的生活，在何种意义上是残缺不全的？

境界

我们的古人实在高明，创造了诸种精致的表述方式，使得一些微妙的经验得以传达。即如“气类”、“流品”，另如“气韵”、“气象”。可惜的是与这些概念相关的辨识能力，已普遍蜕化。对“文如其人”有诸种质疑。文固然不必定如其人，但在修辞的层面，其人的气质品格，确有不能掩者。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如其人亦无不可。学术也如是。境界系于人格。道德人格与学术水平的关系并不直接，却最终决定着学术境界。在这种意义上，学术也如其人。在无行的学人，难以掩盖的，也就是“品”的卑下（如古人所谓的“鄙倍”）。学人在学术中是难以隐身的。观点、具体表述之外，将你暴露的更是趣味、格调，除非你所做的，是批量生产的所谓“学术”，或纯粹的“技术活儿”。鲁迅引别人的话：“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页239），征之我们的经验，谁曰不然！

人文学科的学者的职业伦理不限于“底线道德”（比如不剽窃、抄袭）。除了“好”

“坏”一类价值评判外，学术有时更适于用“境界”、“气象”等衡量。境界、气象不止系于训练、能力，以至才情，还系于其人的生态态度，人格面貌。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一种要求个人的精神投入，甚至与“从业者”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以此为线索读学术史，辨认“境界”、“气象”，有助于在起步之初形成自己的目标。对于学人至关重要的“学术判断力”，关系“境界”、“气象”，最是要求识别力的精微。

也有一些不那么“内在”、与心性不直接相关因而较易于区分的境界，即如博/约，博雅与专精。从来有通才有专才，有博雅之士，有专家之学；途径既分，评价尺度即有别。但无论博还是约，仍各有境界的高下。钱穆写学术史，赞同黄宗羲所说的“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引章学诚所说的浙西（顾炎武）尚博雅，浙东（黄宗羲）尚专门，为学须本性情；批评顾炎武所谓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将“学”、“行”分成两橛，其后的考证之学，专趋顾氏博学一边，“至于行己则有耻已得，不复深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页31），强调的无非“学”与“心”与“行”的相关。钱氏比较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与清代学者——不止于乾、嘉考据学，也包括与顾、黄、王大致同时的阎若璩等人，其间的区分正被归结于“气象”、“境界”。

章学诚说：“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中》，页161—162）性情也要滋养的。功力可由用功而得，性情却不能。但性情仍然不就是宿命。

倘若本于性情，则方向不同的极致的追求，都有可能造就奇观。我说的是“极致的追求”。这种追求从来罕有。无论对于“义理”的穷极求索，还是考据中的务求“一网打尽”，都属于我所谓的“极致的追求”。仅仅“坐冷板凳”还不够，如上一篇所说，还要能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思考、持续积累，力图无“馀蕴”、无“剩义”。我已经提到了“偏胜”。颜元说，有全体之圣，亦有“一节之圣”；“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

（《存性编》，《颜元集》页10、页31，中华书局，1987）。“偏胜”、“偏至”有可能成就一境界，而我欣赏的，无宁说更是精神品质，那种务求抵达能力的极限的锲而不舍的强毅，功业、成就倒在其次。“士不可以不弘毅”。据说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非惟战时，平世也有必要培养这种品质。

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后记》，引了清初梅文鼎自述治学甘苦的一段话：“鄙性于书之难读者，不敢辄置，必欲求得其说，往往至废寝食。或累日夕不能通，格于他端中辍，然终耿耿不能忘。异日或读他书，忽有所获，则亟存诸副墨。又或于篮舆之上，枕簟之间，篷窗之下，登眺之余，无意中砉然有触，而积疑冰释：盖非可以岁月程也。每翻旧书，辄逢旧境，遇所独解，未尝不欣然自慰。”（《绩学堂文钞》卷一《与史局友人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梅氏自我刻画的，正是那种念兹在兹、锲而不舍的专注与执着。接下来梅氏说，自己经由繁难的求索所达到的“易简”，却有可能被认为平淡无奇，“岂知其臻兹易简，固自繁难中出哉！”

“职业”不同于“志业”：所设目标不同，自我期许不同。无论以学术为“职业”还是“志业”，都不妨以此为品格的磨砺，更进而追求不为狭隘专业、职业所限的大境界、大人格。顾炎武说过的“以广大之心裁物制事”，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¹是我喜爱的话，尽管不曾铭诸座右。私心喜爱的，还有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六卷，页601）。我向往上述境界，虽未必能至。年轻学人倘若真的有志于学术，有必要在起步之初思考一些据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不限于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的“立言”之类。学人有可能以学术拓展生命，而不必以“学术”自限。

在高校与年轻人对话，涉及的话题中，有京沪与“外省”。其实在我们这里，并没有18、19世纪法国或俄国的巴黎、圣彼得堡与所谓的“外省”。牟复礼就说过，“欧洲文化

¹ 顾氏《答王山史书》有“君子以广大之心而裁物制事”云云（《顾亭林诗文集》页83）。《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生活中存在过的与‘都会’相对的‘外省’概念，可能在中国也并未存在过（特别是自唐以后）。”（《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页132）京、沪与“外省”的差异，是近代历史与当代政治的结果。我对年轻人说，不必有“外省”的自卑；或许正因出身“外省”，更有可能沉潜、执着，¹也更易于保持与“生活”的联系。顾炎武比较“北方之学者”与“南方之学者”，说前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后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日知录》卷一三《南北学者之病》）。鲁迅说据他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五卷，页435—436）仅仅“机灵”不足以言“智慧”，更无论大智慧。文坛、学界太多巧人、机灵人，太少强毅、坚忍、沉著。关于书法，傅山说的是“宁纯（钝）无利，宁拙无巧，宁朴无妩”（《喜宗智写经》，《霜红龕集》卷二二，页619），此义不是谁人都能懂得。宁钝（非“愚钝”的钝），勿巧滑；不但以勤补拙，而且相信“钝”、“拙”也自有一种正面意义，有可能被由积极的方面利用。即如不那么容易被风气所转移，保有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与心态，所谓“江流石不转”，有一点定力。当然，对“风气”无须一味排拒，不妨在其中又在其外，持批评态度，又不拒绝由风气中得益——新的学术视野有可能因风气而打开，尽管往往另有遮蔽。

因了资讯的发达，资源的共享，旧有“文化中心”、发达地区与其外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只要你确有愿望，你就有机会向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学习。道乃“天下公共”，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沉潜、执著而又力避隘、陋，不存古人所谓的“方隅之见”，包括了不贵远贱近，不借口“本土”而拒绝域外。²大胸怀、大眼界，会在这过程中打开。

我自己也曾体验过“外省人”的自卑。倘若借用那个关于狐狸和刺猬的著名比喻，我

¹ 《书·洪范》：“高明柔克，沉潜刚克”。古人有所谓“天姿近道”（或曰“气质近道”）的说法。我相信“沉潜”最是学术对于从业者性情、品质的要求。

² 我曾反复谈到我自己学术研究中资源的匮乏。直到近来，读一些译著的征引书目，仍不能不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本土”，无异于自我解嘲。我相信我们的学术工作确有不可重复、不可模仿之处，却既应善用所长，又有必要不放过一切机会补所短。生活在这里与“生活在别处”的不同，并非就可以用“本土”描述。经验与感觉的特殊性更有赖于“发现”，非由“本土”现成地提供。

只能是后者，易“凝滞于物”，¹思考往往固着在某些点上；不耐搜剔爬梳，材料的搜罗范围不广；对文字过于挑剔，也有妨于进入研究状态。气质、资禀所限，是治学风格上的刺猬。即使如此，得失也不易论。说句解嘲的话，或许是于焉失之，也于焉得之。🔥

（本篇收入拙作《想象与叙述》附录二。《想象与叙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读者来信】

1. 何蜀

254期中把杨继绳的书名《天地翻覆》写成了《天翻地覆》了。这本书名人们经常写错，需要格外注意。🔥

2. 陆水林

254期《烂尾工程》一文的题记：北大社教运动最终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它不仅没有解决北大原有的问题，总结出什么高校社教的“经验”或“文件”，反而激化了矛盾，加深了分歧，演变为一场“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这段话只是加引号的部分来自陈徒手，没加引号的部分来自作者古樟。贵刊把这一段都归为陈徒手了。谨此指正。🔥

3. 胡宗式

254期刊登了我对杨继绳《天地翻覆》一书的意见，其中说“聂元梓到中央上访”无有此事。我的理解有误，聂元梓找过田家英，应当算是到中央上访。特此更正。🔥

¹ 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说，“……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页274）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二、定制服务：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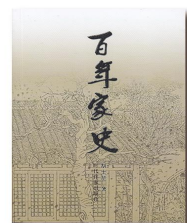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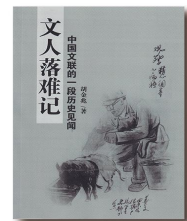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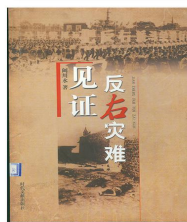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